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0/865
13 November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国转递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 1985 年 3 月 13 日第 1985/36 号决议第 14 段规定编写的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临时报告。

85-31746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 的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临时报告

目 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 - 8	4
二、 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9 - 31	5
三、 特别报告员自己的研究之外， 危地马拉境内事件的资料来源	32 - 43	12
四、 警察和司法机构在解决侵犯人权案件 方面的作用	44 - 62	17
五、 危地马拉境内关切这种侵犯人权案件 的其他组织	63 - 85	21
六、 关于侵犯人权的特定指控	86 - 145	28
七、 失踪	146 - 162	48
八、 秘密监狱和民间巡逻队	163 - 172	57
九、 发展极和模范村镇	173 - 198	59
十、 关于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其他项目	199 - 217	69
十一、 选举进程和新宪法	218 - 238	73
十二、 在墨西哥的危地马拉难民	239 - 240	79
十三、 其他事项	241 - 243	79
十四、 结论	244 - 250	81
十五、 建议	251 - 259	82

目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附录一		84
附录二		87
附录三		88
附录四		89

一、 导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了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问题，并分别通过第12(XXXV)号决定、第32(XXXVI)和第33(XXXVII)号决议。

2. 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第1982/31号决议，并根据决议请委员会主席委任特别报告员一名，研究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

3.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在1982年12月17日第37/184号决议中请危地马拉及其他有关方面与特别报告员合作。

4.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第1983/37号决议，其中对尚未提名特别报告员表示感到失望，并再次请主席尽快委任特别报告员一名。

5. 委员会主席与主席团协商后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决定委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王室法律顾问 Colville of Culross 子爵为特别报告员。Colville of Culross子爵表示愿意接受任务。特别报告员的职权由委员会第1984/53和1985/36号决议(案文见附录一)予以延长，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137和1985/146号决定核可。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和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了报告(分别为A/38/465、A/39/635、E/CN.4/1984/30和E/CN.4/1985/19)。

6.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85/36号决议第14段规定提交大会的；最后报告将于1986年2月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7. 报告讨论下列要题：

- (a) 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 (b) 除特别报告员自己的调查研究外关于危地马拉情况的资料来源；
- (c) 警察与司法部门在解决侵犯人权案件方面的作用；

- (d) 危地马拉境内关心侵犯人权情事的其他组织；
- (e) 指称侵犯人权的具体情事；
- (f) 失踪；
- (g) 秘密监狱和平民巡逻队；
- (h) 发展标准和模范村；
- (i) 其他有关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项目；
- (j) 选举过程和新宪法。

8. 讨论议题的先后次序并不反映其重要程度；所有议题均需加以审议，以全面评论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

二、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9. 经特别报告员在过去两年提出其报告后，有两个机构就如何改善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向他提出建设性建议。 其中一个危地马拉反对党派统一代表组织（反对党统一组织），另一个是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两个机构均以书面提出其意见；特别报告员与他们讨论了问题，显然与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讨论较为深入。

10. 特别报告员并不低估方法的重要性。 人权委员会在七、八年前才开始委任特别报告员、代表和其他人员，授权他们调查国家或某一类侵犯人权的情事。 统一的方法不但难于实行而且可能不合要求，因为被调查的情况和事件有很大的不同。

11. 国际大赦社秘书长 Thomas Hammerberg 于1985年4月12日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题为《人权：消息资料的斗争》的文章，其中指出：

“为了人权工作，必须对妨碍和破坏人权问题报导的企图予以反击。 联合国应比以前更为有力地质询拒绝对商定的调查程序给予合作的政府。 新闻和志愿组织应坚持自己进行工作的权利。 ……虽然有些政府阻挠调查工作，但这并不可以减轻报告员收集资料的责任。 施加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往

往被反对党派以及政府作为政治武器使用。 单这一点就应该谨慎小心行事。

“此外，发表调查研究拙劣的报告只会弄巧反拙。 即使是细微的错误也可以损及最认真的报告。 不能经受仔细查核的报告事实上打击整个人权报告工作的信用。

“因此更加有必要严格讨论人权报道者，不论是新闻界、联合国报告员或非政府组织所采用的技巧。 这种讨论应包括调查、评价和发表的方法。

“第一，调查。 施用酷刑的中心很少有独立的目击证人。 但有时还是可以从表面证据证明明确曾施用酷刑。 身体检查有的时候可以证实囚犯的证供。 其他囚犯的报告可补充重要资料。 刑事侦察知识偶然可以澄清案件。 所以，调查工作往往需要煞费苦心，从尽可能多的来源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

“官方资料来源必须加以利用。 无论对政府的指控如何证据确凿，政府方面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地，调查人员必须独立于当局，而且表面上也应该这样。 带着军方陪同到危地马拉农村调查的联合国报告员如果查问该村曾否发生屠杀事件，他可能不会有切实的答复……。

“第二，应当以专业态度透彻评价资料。 理想的报告应以若干独立资料来源作为根据，以便反复核对。 这并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经常面对的难题是，应该怎样对待看来可靠但无法确实的资料。

“在有的情况下可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因为指控虽然未能充分证实，但已有证据足以要求进行调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将举证责任推到政府身上。 政府本身的反应可以是这个评价过程的一个因素。 它有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如已经提审，审讯是否公开？控告罪名有没有公布？在以前同类案件中，当局采取什么态度？

“若干陷井应加避免。 其中一个重复采用表面看来独立和可以证实的

资料。证人往往向各方散播其指控。这些指控随后在不同团体的不同报告内出现。但原来的报告可能是同出一源，而且不一定可靠。最恐怖报道可能未经彻底核查便加以散发。这是人之常情；假如消息骇人听闻，报道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易受到质疑的。因此，核查报道的机关和机构更加必须形成一种凭理智严谨查核的风气。

“第三，发表并不只是成为头条新闻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手头资料不足而假充齐备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最好还是公开指出资料不足之处。

“此外，读者有权知道报告如何编写，采取的方法，包括的期间，采访了多少人，曾否就地进行调查，等等。在提供这类资料方面，报纸往往有很多问题。

“但这里最大的难题是，消息来源往往必须加以保护，不能将其姓名公开。这没有办法解决；但记者本身必须避免滥用这个好理由来掩盖草率的工作。”

1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这些意见（提到他本人和指称的屠杀之处是指 Santiago Lxcan （见 E/CN. 4/1985/19, 第 31—41 段）那些边远小村庄和据称的证人的下落迄今没有进一步确定）。时间压力可能不利于这些理想，但它们仍然是理想的做法。

13. 反对党统一组织于 1985 年 2 月提出对方法的批评意见。特别报告员仔细地研究了整个文件，并在下面列出反对党统一组织建议的具体改变办法及特别报告员的评论。

“4. 研究危地马拉境内情况的一些建议

在细心研究过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后，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若干行动以保证情况的正确分析。

(a) 人权中心应收集所有有关危地马拉境内情况的资料。应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和以统计形式发表。”

14. 人权中心事实上已在收集和整理资料。但在一些指控的基本正确性和指称负责的人的可靠性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对所有国内罪行编造统计并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

“(b) 特别报告员应每两个月从人权中心从到一次报告,并决定哪些指控需要作进一步调查和应该立即向危地马拉政府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能理解,以目前的镇压和指责程度,为什么特别报告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援助受害人)”。

15. 特别报告员经常获得有关危地马拉境内事件的报告。但假如考虑采用一个更周密的系统,这不应仅限于这项职权,因为这将导致特别程序下的所有其他外地工作团要求同样扩大其系统,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人员和资源问题。特别报告员经常保持着记录,将下一次访问时应该调查的事项记录在案。他实际上确曾插手个别案件,与政府进行正式接触。关于失踪的问题,他深知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也同样做,在必要时采取紧急程序;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具体陈述,特别报告员起码对其中一项就地进行了调查(Contel, Quetzelnango)(见E/CN.4/1985/19,第52-59段)。

“(c) 细心分析了这些资料后,特别报告员应计划到国内的调查,具体行程事前应予保密,但可让有关各方知道日期,使他们能够向他提出特别请求。”

16. 特别报告员的做法完全与建议一样。他在抵达危地马拉前并不通知其工作人员,除非是要求与政府人员、国家官员和国内其他领导人会晤,需要预约时间,过去,当特别报告员乘直升机前往据说发生侵犯事件的偏僻地区时,军方要求两天前获知将去调查的大概地区。在尽可能情况下,具体地点在起飞前或在从预定的着陆点乘汽车抵达后才予公布。

“(d) 特别报告员应由一名能操流利西班牙语的人陪同。除正式访问外,他绝不应由军方人员或政府官员陪同或使用军用或官方交通工具。他应请联合国、红十字会或其他国际组织提供陪同人员。”

17. 尽管有着各种传闻，但事实是，特别报告员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求必由一名具有充分资格和最高水平的联合国西班牙语——英语译员陪同。军方或其他政府译员都没有使用过。如果有必要与不懂西班牙语的人面谈，一定在当地平民中找另一名译员。特别报告员很乐意解释两次稍有例外的情况；两次他都感到十分满意，认为翻译准确无误。

18. 关于使用官方交通工具和接受官方陪同的意见完全可以理解。Hammarberg 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指出同一点。但有一个问题。不容置疑，危地马拉的城市和农村都有暴力事件。发生暴力和冲突的地方自然会有侵犯人权的情事。虽然担心各人的安全，但特别报告员仍然觉得必须去这些地方调查。但政府认为它要对联合国队伍的安全负责。在开始执行其任务前特别报告员和政府达成的安排包括尽量减少陪同队伍人数。通常是内政部人员一名和不携带武器的民装军官一名。在到达预定目的地后，特别报告员在没有任何政府陪同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口头调查。撇开预算问题不谈，要求当地联合国机构或红十字会承担这些责任是不切实际的。但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8月前往调查时没有要求使用直升机去若干据称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地方。他从公路去。鉴于Patzun 和 Santiago Atitlan当地的紧张局势，这也是谨慎的做法。但这有不利之处，例如，花了五个小时毫无收益的白天时间在交通上；附近一个城镇的几件事都没有去调查，另一起指控的当事人也没有前往查访。

“(e) 所有会见都应在一切危地马拉人可容易去到的地方举行，并应在不受恐吓和没有恐怖气氛的情况下进行。”

19. 关心到危地马拉境内人民可否见到他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总是广为宣传。希望与特别报告员接触的人似乎没有任何困难，虽然在这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驻地代表的合作至为重要。

20. 经常只能就地向有关的人进行调查。要说服一个在边远村落的当地家庭

向一堆突然出现的外国人详细说明户主失踪情况已经不容易。他们可能感到害怕；但如果适当地查问，他们仍然可提供很多资料。以为他们会去其他任何地方见特别报告员简直是妙想天开。

“(f) 特别报告员在调查后向危地马拉政府提供对其提出的指控的资料，以便政府作出解答，同样地，特别报告员也应将针对人民和革命部队的指控通知反对党派，以保证这些指控获得适当的处理。”

21. 反对党统一组织提到的指控是关于若干由“穿着平民服装，携带大规模武器”，通常在夜里行事的人所犯下的行径究竟是谁负责的问题。事实上谁也不知道那些人的来历。如果人民和革命部队愿意秘密地或以其他方法通知特别报告员，解释任何事件，特别报告员将乐意讨论这些问题。

“我等反对党统一组织成员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请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履行：

(d) 公开危地马拉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关于特别法庭审理的案件和被非法拘留的人的名单，和说明名单上所有人后来的遭遇。”

22. 目前还没有正式这样做。但特别报告员相信详情是知道的。

“(b) 特别报告员慎重报道圣卡洛斯大学、天主教会、学生组织和工会的情况。”

23. 那些方面已在1985年8月进行了部分调查，但同意尚需进一步调查。

“(c) 特别报告员报道在危地马拉城外见到与游击队在一起，但本来报称在危地马拉境内失踪的两个人的名字立即交给人权委员会”(见E/CN.4/1985/19,第81段)。

24. 特别报告员的通报人已被谋杀。

“(d) 互助小组提供的危地马拉境内失踪人士名单应通告人权委员会成员，

并要求特别报告员根据他在危地马拉公开作出的论断，明确指出其中哪些人为起义部队的人。”

25. 名单并没有秘密可言，那些人失踪的情况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提出这一点是有错误的看法。问题的根本是，那些参加游击队的人往往没有通知其家人或政府，然后又用假名。特别报告员与一些人谈过话。他们就是这样做，但后来利用继续有效的大赦再出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失踪名单上。但要求他们在更早的时候表明自己身份是天真的想法，而特别报告员又没有资料来源可协助他识别出这些人。

26. 但特别报告员确定，政府高级官员没有任何系统可帮助他们将那些利用大赦的人的名字与失踪名单互相核对（见下面第150和151段）。

27.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代表也向特别报告员提交了意见。特别报告员于8月在去危地马拉之前与他们见了面。他们提出的个别事项报告于后。但有些较主要的问题需加讨论。

“特别报告员不应作为私家侦探。他仅应报告侵犯人权的指控和司法及其他当局对这些指控的调查。”

28. 当然，任何政府都自行决定他们是否准备对指称在其境内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危地马拉政府没有这样做，最多也只是略为对指控作出反应。例外是关于Patzun市事件，以E/CN.4/1985/60文号印发的文件（见下面第101(n)段）。因此，只要求在一边列出指控，另一边列出政府的解答的办法将完全一面倒。无论如何，这项工作不需要任何特别报告员也可以进行。他最后同意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看法，认为其实地调查虽然因时间而受到严重的限制还是发挥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自己进行调查。

“特别报告员应在其报告内包括反对现政府的人的看法，即使这些意见与

特别报告员的不同。关于模范村、平民巡逻队和机构协调系统的发展是其中一些例子。”

29. 特别报告员已经是这样做。

“其他已印发的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和文件应同样广为宣传。”

30. 特别报告员对最近的主要报告作了摘要和作出若干评论。

“报告应包括各种侵犯人权事件的统计数字。”

31. 上面已讨论了这一点，进一步评论见下面第89至95段。

三. 特别报告员自己的研究之外，危地马拉 境内事件的资料来源

32.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1985/36号决议第15段中要求特别报告员“继续考虑到从一切可靠来源取得的资料”。1985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危地马拉人权问题的一般性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对之作了解要说明，并就其内容作出评论，可能有助于判断其可靠性。其他的较具体的评价将在后文中提到。此外，特别报告员对下列各定期出版的材料进行了研究：

(a) 在墨西哥城的危地马拉人权事务委员会（危国人权委员会）出版的每月分析报告；

(b) 在危地马拉境外的公正与和平委员会出版的每月分析报告；

(c) 在墨西哥城和布鲁塞尔出版的一份新闻社每周报告“Enfoprensa”；

(d) 在危地马拉城出版的危地马拉新闻，主要是《自由日报》和《图片》报。

国际民主律师协会

33. 该机构是经承认的非政府组织。1985年1月一个三人小组访问危地马拉，其公布的报告中“结论与前瞻”部份简介如下：

(a) 虽然被谋杀和失踪的人数较 1978—1982 年期间为少，但其数目仍然很高而且这类事件每日发生：

(b) 失踪者的家属仍在四处打探其生死下落：

(c) 1985 年秋季选举前的活动是一场政治表演，目的在争取美利坚合众国的军、经援助，改善其国家形象：

(d) 新宪法中的人权规定将不会真正实施。

(e) 1954 年以来的危地马拉选举历史上时常发生贿选及军事控制的情事，1984 年的选举虽无贿选，但是由军方控制。下一次情况亦将如此。文人政府将处理全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困难问题，而军队继续控制国家安全和战争。三人小组也确切知道，总统候选人早已十分清楚军方的要求：不准土地改革，不准税制改革，不可象阿根廷那样调查死亡和失踪人士，不可过问军警的滥权或贪污情况，军队自治。如果违反这些保证就会爆发政变：1966 和 1970 年的总统曼德兹·蒙蒂奈格罗就是前车之鉴：

(f) Mejia Victores 政权不断地侵犯人权，进行大屠杀、非法处决、失踪和秘密监狱：

(g) 特别报告员说：“失踪之事已成过去”：

(h) 军方通过“机构协调”方式已将全国体制军事化，以保持其经济利益：这就是发生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原因，新的选举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

(i) 危地马拉的民主必需消解军方权力：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尊重法律的司法独立，多元选举，不得迫害中间或左派，调查过去的滥权事件，谴责滥权者，以此作为新政府正直的试金石。

34. 报告的作者深信，即使政府换人，军方将继续残杀、酷刑、绑架平民以维持其有效权力。

35. 以上均为历来惯常的指责和预测。值得注意者，小组无意接触特别报告

员，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同特别报告员都同时在危地马拉。特别报告员可能非常愿意听取他们的证辞，引用他们在访问中的谈话。他们具体提到四宗分别的失踪案，认为都是安全部队干的。事件发生在1983和1984年。

36. 致于结论，特别报告员并非不同意上述(b) 和(i)；认为(a)是夸大之辞，(c) (d)和(e)是揣测之辞；(h)并无证据，(g)并非实情，特别报告员的解释是，协会的小组虽然在危地马拉，但他的报告中表示，他的报告是在他们之前出版的（见E/CN.4/1985/19，第67段）。

37. 小组具体指出，他们未曾读过特别报告员的任何报告，但读过一篇对其批评的文字。他们曾向广泛人群进行过数字访问，但并未至首都以外地区，特别是不曾去过任何“发展标杆”。

不列颠议会人权组

38. 该非正式组织的一个二人小组于1984年10月访问了危地马拉。他们向特别报告员提出一份初步报告，但他们的最后文件提出的时刻太晚，特别报告员的前一报告中未及作出评论，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以前的报告中未将该组的最终报告列入建议“再读”的文件中。

39. 该二人小组的访问方式是1984年10月在危地马拉访问了六天，随即往墨西哥访问三天。在访问月初，两名研究员纪录了证辞，根据他们的报告，他们会见了政府高级官员，军方成员和政党领导人，在危地马拉纪录了总数70名的证辞，在墨西哥纪录了10名，以及一系列工会代表，互援团（互相支援团体）和人权组织代表的“集团证辞”。他们表示，虽然所得到的侵犯人权的证辞是1983年及以前的，但报告的重点是1984年以及尽可能直到最近，即1984年7月1日以后，国家宪法大会选举期，证辞采不记名方式。但其中并未进一步指出小组会见的人的正式官衔，亦未指出是在首都以外的何地（如果去过）。还有些内容是关于国内不同地方的个人事件和“发展标杆”及其强调的政策。一幅地图的注释中标明某些村子，例如Quiche的伊克赛·特莱安格，实际就是“监狱

营”；它们被说成是“难民”或“再教育”营：来源是在马纳瓜的危地马拉流亡教会，还有许多附有解说的照片：除两张外都附有日期，在印发的个别证辞中，各有一份是1982和1983年，另三份是1984年。

40. 报告员调查的发现如下：

(a) 过去30年期间被害和失踪人的统计数字是按全部和全盘数字列出；1984年续有被害和失踪者，较1983年增多；

(b) 武装和民警巡逻继续实施集体和个别杀害与绑架。

(c) 工会、学生和其他城市工人的领导人持续遭到杀害和绑架，数字约平均每月50人（较1983年增高）；

(d) 政府方面声称，失踪者是游击队或罪犯所造成，或因被送往古巴或苏联受训，这些说法是“无耻谎言”；证据显示是国家安全机构干的；

(e) 民警制度是一种非自愿服役的形式，强迫农村人民参加绑架、殴打、酷刑、强奸和谋杀以及侵犯自由的行动；

(f) 模范村和制定发展标竿政策两事又为农村人民带来进一步灾难，使这些地区的生活全面进入军事化；

(g) 在农村和城市中心继续对政治犯和普通罪犯施用野蛮酷刑；

(h) 严厉压制走向“民主开放”的政治运动，军队如同过去30年一样将继续控制一切。中间和左派政党将不能参与政事，否则便需冒个人生命的危险；

(i) 关于人权改善的事令人怀疑（接有关于特别报告员以外的国际援助政策的建议）

41. 报告中也载有以前同类报告中已报告过的关于据称的各种滥权情况。统计数字系根据其他组织所公布者，但未包括分析文字，亦无任何迹象显示所附照片是与小组目击或证人证辞的描述有关。报告中所引的个人案件均无意向当局追诉，

这些案件似乎亦未提呈当局要求其意见或答复。

42. 因此，特别报告员对不列颠议会人权组小组使用的方法以及因此而作的报告的可靠性表示保留。特别报告员从自己的经验得知，危地马拉本身、墨西哥或其他地方所提的证辞有时是属实、正确的；其余的确实性则大可怀疑，因此希望能再作一次调查。

其他组织

43. 1985年访问过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的其他组织包括：

(a) 国际特赦，未发表声明但于1985年10月出版了一份报告。1985年5月一个三人小组访问危地马拉，1985年的报告中未提到这次访问亦未就这方面作任何说明，国际特赦提到特别报告员1984年11月的报告，复录了一件在圣伊德瓦索，伊克斯塔华坎发生的据称侵害人权的案件——但没有提到特别报告员就此案所作的调查（见E/CN.4/1985/19，第47-51段）；

(b) 国际社会主义者，据特别报告员所知，该组织事后既未发表声明亦无报告；

(c) 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危国人情情况有所改善；最坏的事是常发生绑架和失踪案；应该将所有被拘禁人士开列一份总名单。至于民族解放运动（民解，一政党）所指控，在援助计划分发的食品中掺用药物使土著妇女集体绝育的说法（见E/CN.4/1985/19，第26段）经审议后已驳回；

(d)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曾派代表团于1985年初访危，其报告已在第156段审议；

(e) 人民权利与解放国际联盟，一个已被承认的非政府组织，其所提报告已载在文件E/CN.4/1985/NGO/21。该报告以批评的语气提到特别报告员以前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其他组织的文件并提到1981到1984年期间的某些事件，报告中并无任何第一手资料或任何原始研究的迹象。

四. 警察和司法机构在解决侵犯 人权案件方面的作用

A. 法 治

44. 特别报告员以前的报告中曾表示过他们认为是危地马拉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严重缺陷(见 E/CN.4/1985/19, 第 110—117 段)。他在 1985 年 1 月访问时没有找到机会同最高法院院长讨论此事;但在 8 月访问时讨论过。

45.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危地马拉的刑法程序是根据拿破仑法典,另加上若干保护被告的规定(在使用拿氏法典的国家中并非全部都加上这些规定)。而特别报告员是来自以普通法为背景的国家,除非他对这些法律文字所知全部正确,否则似不适合由他对刑法程序作出评论。但他表示听说,多年来这些刑法程序未全部有效遵行。

46. 当前对司法制度效率的检查必须从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始:有 80 名以上的司法、法院工作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在 1980 年代初期被杀害。其他的人也必然遭受严重的威胁。这些事件造成的创伤是不能在短期内平复的。问题不在贪污,而在恐惧。而其他国家却无不将司法和法律专业人员放在重要位置以清除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将罪犯绳之以法,实施法治。如果司法或法院工作人员的事业选择存在潜在的危险。应用适当的方式承认这一点。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及官员全体将得到国际的了解、支持和协助、并提供有益的咨询意见。

47. 危地马拉当局有其自己的计划。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法官和司法人员的课程。新的司法官任命资格已较以前要求严格。这对于和平法官作用的影响(和平法官对罪犯可进行头三天的初步审查)在农村可能值得详细审议。目前,和平法官多为市长,没有法官资格但有能力调查事实和作出结论。必须要有具备专业素养的律师并熟悉当地事务的人类充任此职。此处问题的重点在于司法体制中的专业训练和专业才识。

4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一个案件是1984年4月曾经刑事法院审讯并引起新闻界注重的案子。此案为在上维拉帕斯的弗赖巴托洛米德拉卡萨斯市的20名民警巡逻队涉嫌杀死一对夫妇及其12岁和11岁孩子的血案。此案似起因于亚克萨和圣布埃纳维斯塔两村间向有仇隙，一家族寻仇而爆发的。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起初是集中于某些发回更审的技术问题。最高法院院长提出了法院判决书，其内容似引起了对当前刑事程序的广泛注意。特别报告员在作出任何进一步评论前正听取技术性的咨询意见。

49. 不论这个案件是否能说明辩护刑事案的判罪问题，警察都是司法程序中的关键因素。他们说，特别是在绑架、劫盗或谋杀方面，假设无罪的作法都很极端，结果变成，这类嫌犯如不是在第一次诉讼程序中法官以仅有15天的调查时间即将他起诉外，大多数这类被控者结果都释放了。公务部虽有权以检查官名义对嫌犯起诉，而且也常这样作，但这显然很少能保证被告会因之而赴庭受审。目前，警察与法院一直维持着良好关系；双方已开始对话，警察和司法官应更了解在刑法程序方面他们各自的需要。

50. 截至目前特别报告员尚未发现有任何事实是使他改变认为必需打破这一严重恶性循环的看法。许多被控犯严重罪行的人，包括变节警察，均被带到刑事法庭。很多人因为证据不足或不当而释放。证据不足部分由于公众不愿合作或提供证据。这些不愿意保证是因为对司法制度缺乏信心，以及被告人可能被立即释放；或因为认为他们会对任何供证人进行报复。等更多严重罪行相继发生时这个问题便会益形严重。

51. 该国的国家元首、最高法院院长和警察总长均希望得到国际援助提供训练顾问，以改善这种长期的弊病。（见第252段）。

52. 关于民事救济办法方面，特别报告员询及法官在推行人身保障令（Recursos de exhibicion personal）方面的成绩如何。最高法院院长说，1985年，对1,074人发出了303次保障令。有些是CDHG发出，从Grupo de Apoyo Mutuo

发出的保障令涉及人数是706名。这些案件并不限于1985年，而是包括以前若干年。在这方面，最高法院院长曾亲自接见了该组织的代表。

53. 法律程序已经确立周详，特别报告员认为主司各案的法官将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全力而为。应该说他们愿意去亲访监狱和警察局。最高法院院长本人就曾亲自视察首都的首要监狱，巴凡监狱，并曾视察到所谓地下狱室，过去传言谓此处是监狱中的秘密牢房，事实上该处确有地下层牢房，但据囚犯告诉他，他们是为逃避其他囚犯的压力而自愿要求到地下层的（见下文第166段）。

54. 1985年法官施用《人身保障令》的成绩是，发现了三种不当拘禁案：一名未成年少女，一被拘禁之男子和一逃家的年青妇女。

55. 这类活动耗用了大量司法时间。特别报告员认为，他们无疑会受到批评，因为成果不佳（除了以上的三案）。这里的原因是据传另有拘禁失踪人士的拘禁中心而法官并不知情，因而也更无从去探查。因此，再次引出了对整个秘密监狱问题的注意。

B. 国家警察

56. 特别报告员在首都的国家警察总部会见了一些资深警察。全部经过均有新闻记者参加。目前的警察总长是具有20年资历的专业警官 Alvarez Arevalo 他于1985年6月1日从前任的一名陆军上校负责人那里接手这个位置。特别报告员提请国家警察注意某些杀人和失踪案并要求就其提出调查的进展情况。警方则希望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些他们认为与其问题有关的资料。

57. 1985年1月1日到1985年8月6日期间，有24名警察（包括一名女警）在执行职务中殉职，主要是在危地马拉市；特别报告员手中。报纸内登载了其中的20个案件；其中六名警察是特别小组的。虽然有些杀人犯已被捕，还有很多仍未有踪迹，通常即将其称之为“一伙身份不明的持械者”。一名警察的尸体上咽喉部有香烟烧痕。

58. 受伤的警察至少有12名，其中有重伤者，包括一名女警。

59. 同一期间调查发现有更多的警察人员牵涉在犯罪案中。特别报告员有一份96人名单，其中有两名检查官。名单的时期是1985年1月1日至8月16日。犯罪内容包括凶杀、恶性抢劫、强奸、绑架、贩毒，诈欺及其他较轻罪行，事实上的数字可能不止于名单上开列的数目，因为名单中尚不包括其他报纸上据报因犯罪活动被捕的警务人员，其中有警察技术侦察部四人和四名被警察总局开革的贪污人员以平民身份移送法院。另外因违纪而被开革的警察约有145名。

60. 虽然全部被控犯罪者均解送法院，但警方告知特别报告员，该96人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士并未受审，而是被法官调查后释放。此事在以前报告中曾提到（见E/CN.4/1985/19,第110段），并在上文第49和50段中讨论。结果之一是，一名前警员曾因谋杀罪被捕，其后60天，又因其他罪行再次被捕。他是在第一次的控告后被释放的。

61. 据警方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材料指出，他们搜救被绑架者，包括儿童和少数人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也逮捕了许多偷盗、诈欺、贩毒等的犯罪帮派。他们声称侦破罪案90%；新总监上任后两个月内逮捕了谋杀或较轻罪犯共7,059人，麻醉药品罪犯147人，在汽车窃案625件中，有523件寻回。这当然是很优异的成绩，但仍有两个问题：

(a) 这些被捕者中有多少移送法庭，更不用说定罪？这里并无统计数字，最高法院院长亦未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供作约略估计；

(b) 为什么警方成绩最差的领域，设约占10%，是以政治敏感性的谋杀和失踪为主？警方自己提请注意公民不愿提供消息、不愿合作、没有信心的问题。

62. 警方正在集中力量进行自清工作，这是绝对必要而在其训练学校和法律服务中要不懈追求的。遗憾的是他们尚未解决最令国际瞩目的问题。当然，如果这些罪行真能在危地马拉境内解决的话（见第82和148段）。

五. 危地马拉境内关切 这种侵犯人权案件的其他组织

63. 一直到最近, 危地马拉境内并没有任何关切人权的内部和非政府组织或团体在活动。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过去两年能够进入该国, 但是由危地马拉公民组成的另一些团体, 却决定把它们根据地设在国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在该国境内安全地进行活动。

64. 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再度觉得能够这样做, 并且他们向往能够让他们回国的自由与安全。但是, 过去的怀疑仍然浓厚的纠缠着。正如特别报告员过去所报道的, 1980年代的惨痛分裂以及同游击队的继续冲突的不利影响是很不容易康复的。在这方面, 危地马拉同一些其他国家并没有差别。

A. 互助组

65. 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 过去几乎一年中产生了一个组织, 现在名叫互助组, 那是由失踪人士的家属组成的(参看E/CN.4/1985/19.第88和89段)。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1月同它的领导人和一些成员举行了一些会议。互助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团体。

66. 互助组在1985年继续起工作, 进行和平示威和许多其他的公开活动。它的领导人同国家元首和大主教以及许多其他人士进行了对话和会议。互助组到目前为止并不接受危地马拉政府无法解释失踪人士的遭遇。

67. 互助组在1985年遭受到三个严重的挫折, 造成了很大的紧张和忧虑。

68. 一个挫折是它的一位领导人玛丽亚·罗萨里奥·戈多伊·德奎瓦斯, 他的两岁儿子奥古斯塔·拉斐尔·奎瓦斯·戈多伊, 和他你胞兄米诺尔·戈多伊·阿尔达纳(21岁)的死亡。据说他们在1985年4月4日上午离开家到首都的一个购物中心去购物。他们的尸体后来在当天晚上在距离城市有一段距离的深谷里发现。戈多伊女士的丈夫, 一个在圣卡洛斯大学政治系读书的学生, 1984年

5月15日失踪，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认为那是政府的安全部队干的。它也说戈多伊女士由于参加了互助组，以前曾经接到死亡威胁。

69. 另一个死亡的是埃克托尔·奥尔兰多·戈麦斯（32岁），他是一个失踪人士的兄弟。他的尸体是在1985年3月31日被发现在距离首都26公里的阿马提特兰附近通往太平洋海岸一条主要道路的路边。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表示，他曾经受到威胁，如果他继续询问关于他的兄弟的失踪，国家警察也在找他。据说他是在参加一个互助组会议之后等公共汽车回到阿马提特兰时，被一个不明身份而全副武装的人员团体所扣留。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报告说，他的尸体被发现有利刃的伤痕，没有了舌头和牙齿。他们担心取得一份关于他的尸体的官方解剖报告副本会有困难，恐怕他是被勒死的。

70. 另一个说法是在1985年6月18日的《新共和》上，是由皮罗·格雷杰斯所写的，他提到埃克托尔·奥尔兰多·“努涅斯”于1985年3月30日在一个公共汽车站被四名武装平民所绑架。他的尸体“第二天被发现。他是被殴致死，他的胸部和头部都破裂，他的舌头被割掉”。

71. 就如每一件有关刑事调查的东西一样，一个解剖报告在检查法官进行他的初步调查的15天期间之后，就成为一项公共文件。最高法院主席给了特别报告员一个副本。该副本列在增编四内。特别报告员指出，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戈麦斯先生的舌头和牙齿不见了。该报告也没有指明是被勒死；头骨的底部有一个裂痕，但是死亡的原因由于肝脏破裂而导致内部出血。没有人因这项罪行受到逮捕。

72. 第三个挫折是根据危地马拉报纸在1985年6月中报道，阿德里安·戈麦斯·卡利托先生的家人离开了危地马拉。他和他的妻子以及7个子女到加拿大去。报纸报道了失踪的背景；戈麦斯的兄弟，阿纳尔多是在1981年失踪，他的姐姐卡门·约兰达，在1982年和1984年二度失踪；据说她现在是在多伦多。他的哥哥埃克托尔·奥尔兰多被谋杀，已经报道如上。危地马拉政府告诉

特别报告员，这个家族的离开是由当局按照正常手续办理。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说，他在阿马提特兰的房屋实际上是被安全部队所占据。安全部队也时常跑到他的家庭糕饼店去公开显示他们的武器。

73. 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8月访问时，曾经期望再次同互助组会面。戈多伊·德奎瓦斯先生的岳母，鲁特·莫利纳·德奎瓦斯女士特别邀请他那样做；他也答应设法同他们会面。可是在他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尽管想尽一切办法同互助组联系，互助组并不愿意同他会面。他们发表了一份敌意的新闻稿，并且发表评论，在电视和电台上作出报道，表示对特别报告员缺乏信任。进一步的评论十分困难。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任何一份新闻稿，他也无法在电视上看到这件事。所能获得的唯一报刊报道并没有说清楚该团体的控诉是什么。他希望能够恢复联系，澄清这些问题。

74. 在互助组和特别报告员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一个非政府组织，拉丁美洲被拘禁和失踪人士家属联合会的代表，一个爱尔兰公民，帕特里克·赖斯神父，在1985年8月防止歧视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严厉指控特别报告员对待互助组的态度。特别报告员并不是说这样作是有意要误导；但是对于这种大量的错误消息的另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该发言人没有查明事实。他提到互助组的成员戈麦斯·卡利托先生和戈多伊·德奎瓦斯女士（参看第68和69段）被谋杀，以及李欧尼尔·罗德里格斯教授于7月被谋杀（参看第75(a)段）。他接着表示：

“处理危地马拉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对于这些案件都保持恶名昭彰的沉默态度。甚至在他访问危地马拉期间，他从来没有设法同互助组会面，那些家属甚至必须要打断他的活动来向他叙述”。

75. 这两点都是非常不真实的。

(a) 1985年4月8日，特别报告员正式要求危地马拉政府告诉他关于调查

上述头两件谋杀案的进展情况。 他也知道处理迅速或任意处决的特别报告员，阿莫斯·瓦科先生，1985年4月曾经要求关于这些处死案件的资料。 关于罗德里格斯教授被谋杀的消息是在特别报告员动身前往危地马拉访问之前才获知的；

(b) 在他于1985年1月访问之前，互助组已经没有同特别报告员联系（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如何联系）。 他们在他夜间很晚抵达危地马拉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设法与他会面；结果是在大约9点15分讨论并且安排在教堂举行一次正式的公开会议，该会议也举行了。 后来当特别报告会访问国民代表大会时，互助组也出席，并且还带了标语旗和扩音器来帮助国民大会的讨论。 国民大会的官员建议，如果能够在主要的入口大厅立刻同互助组举行会议，可能会有很大的效果，结果也举行了会议。 在相互协议之下，也安排了后来在同一个大厅举行另一次会议，特别报告员可以在会上听取许多亲属失踪的家属的个别证词。这也如期举行了，特别报告员仍然保留了那些家属交给他的详细资料。

76. 已经解释过，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8月的访问期间，尽管作了一切的努力，仍然不能同互助组会面。 他延迟半天离开危地马拉，很明显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以便他们同意作一次访问或者举行其他会议。 他只能表示遗憾这并未发生。

B. 三边委员会

77. 在政府一级上，在人权方面有了一次倡议。 正如先前所报道，失踪的问题使得政府在1984年设立在危地马拉和国外都知道的三边委员会来调查这些案件。 三个当事方是司法部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特别报告员同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内政部长在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题目。 三边委员会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工作并且发表了它的结论和建议，但是在8月并没有公布关于任何个别案件的详情。

78. 内政部长告诉特别报告员关于三边委员会的方法，他以书面的形式说明了这个方法。它进行了一次全国调查，下令该国安全部队的所有人员都合作。军队、警察、移民局、关税人员、财政警察和监狱当局都包括在内，各阶层的民间当局也包括在内：在有些情况下，在当地警察拘留所内监禁的人士是在市政当局而非警察的手上。

79. 三边委员会在它所发表的报告的结论中表示：

“委员会一开始它的工作，就要求有关各当事方给予协助。特别是他要求互助组的代表提供可能帮助它调查各种案件的一切可能的情报。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在文件上所提供的情报，他们认为是证据，却不足够用来进行有效的调查作为失踪的情况，因为声明必须要来自确认为证人的人士，以支持证据的份量。缺乏有关当事方的直接合作，使它不可能完成调查。

“结 论：

“1. 从调查得知，在互助组所提供的名单上的人，并没有被拘禁在任何改造中心或预防性拘留监狱内。

“2. 调查所得出的案件和情况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

(a) 有些人是在据报失踪的那一天之后的一个日期被押送到法院（内政部的报告第20、21和22页）；

(b) 一个在地下活动的人的声明，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被认为是失踪或被绑架，而他们的家属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声明交给了新闻机构。

“3. 不应该认为调查已经结束，因为除了其他因素外，仍然还不可能得到一份移民的墨西哥的危地马拉人的名单，以便决定名单内是否包括任何在失踪人士名单上的人，他现在可能居住在一个营区内。

“ 4. 应有关各当事方的要求，并且按照法律，公共检查官部门在佩滕、危地马拉市、克萨尔特南戈和萨卡帕的刑事处的和平法庭，根据有关逮捕或绑架的控诉，进行刑事诉讼，并且中断已经正在进展的诉讼程序（有关调查的行动和案件，在这些报告内提到）。

“ 5. 在该国许多部门所进行的调查期间，除了为预防性拘留以及服刑而依法设立的改造中心之外，并没有关于其他的拘留机构的存在控诉。在危地马拉市所引证的一个案件中，并不能找到有关当事方所提到的私人住所，因为地址并不完全（档案第2页）。

“ 建议的序言：

“ 本委员会在国家一级进行了所有各方面的官方调查并且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资源。

“ 本报告内的资料数量显示出委员会的每个成员所作的个人努力，并且可以看作是对于失踪问题的一个更详细的调查的开始，目前的政府很注意去解决失踪的问题。

“ 由于这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它需要设立一个人员很多并且有足够时间的委员会，以便能够在不仅是同国家机构，而且是同有关人员充分合作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它的活动。

“ 建 议

“ 1. 应该为调查而成立一个特定的委员会，能够依靠国家机构的支持，来继续调查，找出失踪人士的下落；

“ 2. 将要设立的新委员会应该不包括政府机构或官员，应该由议会成员、专业人员和私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代表组成，也应该考虑到各有关当事方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这样的组成方式，委员会将能够更好地协调，进行

调查并且实现它的目标，并且能够获得失踪人士家属的更多合作，这是双边委员会所没有的；

“ 3. 各有关当事方应该提供给名誉的委员会各种证据，以便使它能够在充分合作之下完成调查；

“ 4. 公共检查官部的总检查长办公室，应该促进对于所报告的案件的调查，并收取进一步的报告以及能够帮助进行适当调查的任何声明；

“ 5. 所有报告的案件都应该公开，以便国家能够通过主管机构，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步骤，直接有关的当事方也能够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步骤。”

80. 这些建议是获得一些同意的，甚至政府的批评者也表示同意。但是特别报告员并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结论”第二(a)和(b)段所提到的案件能够受到部会的确认，以便失踪人士的家属能够核查一些事实。

81. 内政部长在同特别报告员的访问谈话中，解释以上所制定的调查过程。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些例子），对于一位人士失踪的日期之后所发生的事，作了一些澄清。特别报告员向他指出，发表有关甚至于极少数案件的部分资料，很可能鼓舞所有的家属，使他们怀抱希望，认为他们自己的案件也可能得到解决。部长说，已经汇编了几百页的文件，但是在出版详细资料之前，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都必须作进一步的调查。他不能够提供一个出版资料的大约日期，但是他同意应该尽可能迅速去作这件事。

82. 在查明真相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政府的资料在过去显示，有一些失踪人士事实上可能成为墨西哥的难民。部长解释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没有提供给危地马拉政府一份在墨西哥的正式难民名单，虽然已经正式向它提出要求。因此不能够反复核对家属或者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所提出的失踪人士名单和在墨西哥的难民姓名。

83. 特别报告员说，他将建议难民专员办事处向危地马拉政府提供名单（参看

第256段内的建议)。

C. 和平委员会

84. 有一项私人的倡议，是打算检查在危地马拉的暴行的潜在原因，并且建议消除暴行的措施。 它的开展并不顺利。 但是在1985年4月它发表了向许多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以及大众提出的建议。 报刊上并未报导有什么反应。

D. 人权委员会

85. 没有其他向那些正在萨尔瓦多和智利工作的私人组织，进行处理或者试图处理关于在危地马拉的违反人权事件的指控。 所以一个委员会的新章程中给予处理人权问题的检查官很大的权利和义务（增编三，第273、274和275条）是非常重要的。 从1986年1月14日开始工作的这些机构，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尚需拭目以待。

六. 关于侵犯人权的特定指控

86. 在上述的普通出版物的帮助之下，并且通过他自己的调查，特别报告员设法遵照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1985/36号决议第15段的规定，“特别鉴定关于因政治动机而进行的谋杀、失踪、刑求行为、司法以外的处决以及在私设监狱内监禁的指控”。

87. 在1985年的头8个月内，对于这些问题有不少的指控，重要的是要指出，有两个名词在联合国的用法上取得了技术上的定义。 特别注意这个现象的工作组调查了强迫或者非自愿失踪的情况、它的工作只限于调查有显然的证据显示政府机构有责任的失踪情况。 司法之外的处决是特别报告员所关心的情况，他调查了一些案件，其中的人是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显而易见地被政府当局立刻处决。 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上面所引述的指示是太过局限了。 例如杀人、绑架或者残

害身体等犯罪行为，如果是由官方当局以外的任何人所犯，就完全是国家警察所处理的问题，而在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之外。

88. 在许多指控中，并未察觉有这类区别。

89. 正义和平委员会汇编了关于指控违反人权案件的每月清单；它表示清单并不完整，但是提供了所列的每一个案件的详细情况。这一新的清单是1985年1月至4月，按照委员会的惯例，显示出据说对罪行负有责任的人物。特别归咎于军队或政府当局的数目如下：

	一月	二月 ^a	三月	四月
谋杀	51	2+	1	7
伤害	0	0	5	0
失踪	0	4+	1	2

a 二月份“+”的符号是一个报纸上的一份报道，指出有些福音派牧师被谋杀或绑架，但是没有指出这些人的姓名和人数。

90. 数字是显示受害人有多少，由于在一次事件中可能有一个以上的人被杀、受伤或被绑架。在少数的其他案件中，据说是由一个知名的人物或许多人物所干的。所有其他案件都注明是由“准军事集团”或者“不知名人物”所干。

91. 但是，对委员会来说这样做并不公平。“着平民服装的准武装集团”的说法能够由那些希望指出是（任何国家）的安全部队，但是又不想说得太明显的人来使用。其中有些，但决不是全部，归咎于准军事集团的案件，载有资料，说明是一个武装团体所干的。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编制比较精确的数字。

92.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也发表了违反人权案件的详细资料。但也还是不容易查明哪一些指控可以有理由地说是牵涉到安全部队，特别报告员在汇编下表示，列入了显示任何这类情况的案件。

	<u>司法外处决</u>		<u>失踪</u>	<u>伤害</u>
	<u>个人</u>	<u>团体</u>		
一月	6	46	17	3
二月	1	4	14	3
三月	5	8	7	3
四月	2	132	16	1
五月	2	—	9	1
六月	2	25	26	1
七月	2	—	4	2

93. 这些数字包括下面所述事件中的所有据称受害人，除了8月在马拉卡坦的事件之外。

94.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也给了特别报告员他们经过仔细研究的失踪案件清单。失踪人数如下：

一月	8
二月	11
三月	10
四月	16
五月	11
六月	11(3 人重新出现)
七月	<u>7</u>
共计	74

95. 虽然在某个程度上，特别报告员对于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所研究过的详细事件的检查，是他选出了几个也出现在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74人名单内的姓名，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案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牵连到安全部队。但是，特别报告员从已发表的详细资料中选出了并未列在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74人名单内的姓名。这两个分开的做法证明要编辑足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关于事件的可靠资料，而不是一套内部犯罪统计资料，是十分困难的。

96. 根据传言，主要的事件看来都在1985年在以下地点发生：

- (a) 在 Chiumaltenango 地区的 Patzun 市内的许多村庄（参看以下第101—112段）；
- (b) 在 Santiago Atitlan, Solola 之内和附近（第113—124段）；
- (c) Finca Santa Anita, Las Canoas, San Martín Jilotepeque, Chimaltenango（参看第125—130段）；
- (d) Paraje Nil, El Asintal, Retalhuleu（参看第131—134段）；
- (e) Utzumazate, Barbarena, Santa Rosa（参看第135—136段）；
- (f) Nica de Malacatán, San Marcos（参看第137—141段）；
- (g) Mazatenango, Suchitepéquez（参看第142—145段）。

97. 来自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正义和平委员会、“Enfoprensa”和危地马拉报纸的指控也都在以下各段内注明，并且有日期的也注明日期。

98.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和正义和平委员会已经指明上述(a)、(c)、(e)和(f)等事件是“屠杀”或者“集体司法外处决”。正义和平委员会尚未发表它六月份的报告，该报告可能包括(d)事件。“Enfoprensa”已经报道了所有7个事件，就象危地马拉报纸一样，除了(f)事件之外，虽然那可能已经出现在日内瓦尚未收到的几期通讯上。

99. (b)事件主要是否认失踪事件并且获得同样广泛的报道。

100. 政府及其安全部队被控牵连在内的程度可由以下的报道推知。

Patzun, Chimaltenango

101. 这是一个离泛美公路不远的一个较大市区，距首都以西约70公里。在1985年内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如下，提及的所有村庄在该市区内：

(a) 1985年1月30日，正义和平委员会，Chisiquiá, Marcelino and Juan Cocon. 该两名受害人遭军事委员指为颠覆分子被带到军事别动队去。后来别动队否认接受过任何这种指控，并说两人已回家。在到家之前，这两人受到武装的男子拦还严加拷打，然后加以杀害。

(b) 1985年1月23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Xeatzán Alto. Marcelino and Juan Cocón, Justo Morales Cano, Mareclo Jochalaj, Santos Cuy Cum 和 Rosalio Yoyaxuc. 这些人在各自的家中遭受武装行动的被拘之后对去留并失踪。他们的尸体后来被发现，有受过拷打、大量子弹伤痕和撞击的伤痕，尸身已经腐化。(Chocom) (原文如此) 兄弟的尸体在 Chisiquiá, 发现，其余4人的尸体在 Popabaj de Xepatal (原文如此) 发现。这些行动标志了军队针对该市区的村民的重大行动的开端。

(c) 1985年1月30日，正义和平委员会，Xepatán. Marcelo Jochalaj, Justo Morales Chirix 和两名身世不明的人。在遭受军队单位拘留多日后，他们显然遭暗杀。他们被砍头，身上弹痕垒垒。

(d) 1985年1月，和平正义委员会，La Merced. Paulino Citán Miculax, 军事委员。由于他不服从军队命令，晚上遭士兵绑架，翌日在距家2公里以外被发现死亡。

(e) 1985年1月20日，Xeatzán. Rosalio Cos, Daniel Yos Ajú, Marcelo Espital, Santos Cuy, Lázaro Yaquí, Joaquín, Joaquín Yaquí, Mash Yaquí 和其他3名身份不详的人。1月20日，500名军队的士兵抵达村庄，烧毁了一个“棚子”，把8岁的 Daniel 从屋子里头拉出来进行毒打，并用刀子刺伤他。他们把居民集中起来，并表示要他们站几天。1月21日，他们再次把前天拷打过的男

童抓起来，把他和另外8名村民关在学校里，用“Zogas”对他们进行毒打，挖他们眼睛，对他们掩割以及切断他们的舌头。然后他们用汽油把5个人烧死，有3具尸体在 Xetzitzi 发现。3名教士遭武力绑架，但传闻他们在 La Granja Penal de Pavón 出现，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有些人说这些教士被埋葬在学校后面。（特别报告员的说明：据称有11名受害人被杀，可是根据控告加起来只有10人。）

(f) 1985年1月23日，正义和平委员会，Xeatzan Alto。30名18岁以下身世不详的人。那天，数百名军队的士兵占领了村子。他们抓了一名10岁的男童进行拷打，要他供出水开会和在什么地方开会。他们拘捕了30名多数在12岁以下的人杀掉。在另一宗事件中，他们带走了8名年轻人，他们的下落不明。

(g) 国际反对酷刑联合会和基督和平会瑞士分会就Xeatzan村两个部分在这两天的事件也公布了指控。这些指控来自正义和平委员会以及农民团结委员会，并包括了残杀和人被活活烧死的细节情况。据说约有40人被杀，军队要负直接责任。

(h) 1984年12月29日，农民团结委员会。Marcelo Cocón 和 Juan Cocón 的尸体被发现，有受过酷刑的痕迹。

(i) 1984年12月19日，Popabaj。发现4具弹痕垒垒的尸体：Justo Morales, Santos Cuy Cun, Marcelo Jocholaj, Rosalío Yac Chajú。

(j) 西德议会的一名议员 Hans Ulrich Klose 在2月13日对士兵在1月于Patzun 市区进行的屠杀提出抗议。

(k) 法新社1985年2月3日报道，在Xeatzan村大约40名农民遭受屠杀后，该地的800多名村民生活在恐怖气氛中。

(l) 1985年1月28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Patzún. Paulino Sitán Miculax.

遭到身份不明的人袭击，这些人当着他的家属把他枪杀。

(m) 1985年2月，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Patzún. Sinforoso Sipoc Tzuquen. 遭身份不明的人射杀。

(n)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在1985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揭露了在Patzun 市区、特别是在Xeatzan 发生的事件。危地马拉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份声明作为文件 E/CN.4/1985/60 分发：

“关于在 Aldea Xeatzán , Patzún, Chimaltenango 发生的事件，经过调查后证明如下：

“1. 自称为革命武装阵线的颠覆罪犯利用危地马拉 Tecpan 市区的 Pachali 村、Xejabí 村和 Chuatzunuj 村以及 Patzun 市区的 Sebalpop, Zeatzán, Chipiacul, Popabaj 和 Zetzisi 作为他们的行动中心。

“2. 自1984年12月以来，革命武装阵线的颠覆罪犯不断恐吓平民自卫巡逻队，企图阻止他们在各自的市区执行任务，要他们相信危地马拉军队对他们执行的行动不给予报酬。

“3. 革命武装阵线的颠覆分子在撤退期间犯下以下罪行：

1985年1月18日，据报大约30人的一批颠覆罪犯在Xejabí 村和 Chuatzunuj 村之间露营，因此派出4名巡逻队去制服他们。可是这些颠覆罪犯获得风声之后逃往南部，设法抵达Patzun 和 Pochúta 之间的山区。

1985年1月21日，他们经过 Xeatzán 村，在那里绑架了8名平民巡逻队的成员，以防止这些巡逻队员向追踪他们的军事巡逻队报告。

1985年1月25日，他们在 El Pacayal 农场袭击一队流动宪兵巡逻队，杀害了4名巡逻队员。1985年1月26日，他们到达 Santa Margarita 农场，杀害了农场经理 Augusto Castillo Quiroa 先生和出纳员 Román Guadalupe Rivera Santizo。

1985年1月26日，平民巡逻队员 Juan Cocón, Marcelino Cocón 在 Chiquel de Patzún 被绑架并杀害。

1985年1月27日，这些颠覆罪犯到达 Patzun 区的 Mercedes 农场，并杀害了军事委员 Paulino Sitan Miculax。

1985年2月9日，平民巡逻队员 Maximiliano Chocoj Lopez 和 Custodio Morales 在 Xejabi 村遭杀害。

1985年2月11日，军事委员 Florencio Ajmac Xejabi 遭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5. 收到的关于上述谋害的报告一致指出，所有有关的个人是穿上草绿色衣服的游击队并以 AR-15 型和 M-16 型步枪作武装（这些武器不属于军队的库存”。

“6. Chimaltenango 区的保安部队正在做出尽可能最大的努力捉拿这批对杀害一些平民自卫巡逻队队员和军事委员负责的颠覆罪犯。

“7. 颠覆部队以前利用过这种活动，以便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失实的控告作为针对我国进行的诽谤运动的一部分。”

(o) 1985年3月19日至22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Patzun . Lisandro Vásquez Siquajá 在3月19日被身份不明的人拘留，3月22日他的尸体在 Camino de Terracería 被发现。

(p) 1985年4月5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Román Robaric Sipaez 在上班途中不明不白地失踪。 只知他的居住地点为“Patzun”。 其他不详。

(q) 1985年4月9日至13日，正义和平委员会。 土著社区（没有说明那一村）主席 Sebastian Coy 在 Patzun 郊外遭武力架上一辆货运卡车，下落不明。 据说“好几个武装男子”对此负责。

(r) 1985年4月14日和15日，正义和平委员会和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Benito Salvador Ajuchán的妻子投诉她的丈夫在 Cantón Poniente 失踪。5名武装到牙齿的便衣男子入屋要找 Jose Salvador，由于没有找到他，反而把 Benito Salvador 带走，其妻子受到步枪威胁。军队受到直接指责。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据称失踪的男子的妻子听到这些男子称另一男子为“上尉”。

(s) 1985年4月30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Pedro Javier Cuxil, Pedro Sical, Lorenzo Coyote, Enrique Tiquirá 另一男子和2名少年（全部是 Chiquel 村的平民巡逻队队员）受到涂黑脸的武装到牙齿的身份不明的男子从他们家中带走。上述4名男子的姓名在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失踪名单上；和上文(p)和(r)的案件那样，他们特别指出这些失踪是保安部队所为。

(t) 危地马拉报章。2份报纸的文章报道了 Chiquel 的事件。姓名吻合，记者显然访问过村子的人和军事当局。有人在当地的河边发现了属于失踪男子的3顶帽子和一件兰衬衣。

(u) 1985年5月10日至16日，“Enfoprensa”。据称助理市长 Buenaventura Sujpop 报告政府军队当着家属和邻居暴力把7名村民从他们家中绑架走。

(v) 1985年5月10日至16日，“Enfoprensa”。自愿消防队（负责处理死尸）在5月9日接到很多报告，表示在市区内有一个秘密墓穴。当地的消防队队长表示，由于天气恶劣取消了搜索。（有关的地区可能是 Chiquel 村，因为危地马拉报章在1985年5月9日登载了一幅当地消防队车辆的图片。）

(w) 1985年5月19日，危地马拉报章，在 Patzún 镇范围内。平民巡逻队队长和肉商 Marip Gilberto Melgar Juárez 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枪杀。在清早刽子手出现时，他和他的同伴正在喂牲口，他们被迫躺在地上，受害人被认出来并遭受枪杀。在该事件中这些人没有说话（国民警察的报告）（）

(x) 1985年5月18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Patzún。肉商 Mario Gilberto Melgar Juárez 清早被几个身份不明的武装男子看见在工作，这些人告诉所有的工人躺在地上，然后向 Melgar 先生开枪，向他打了致命的一枪。他是平民巡逻队队长。

(Y) 1985年6月18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XEATZAN BAJO. 20名年龄不同、身世不详的村民遭军队的成员处决。根据一名由农民团结委员会提出的目击证人在墨西哥的控诉,这20名受害人被残暴地从他们家中拖出来,手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士兵把尸体抛弃在村子的学校里面。

(Z) 1985年6月18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Enfoprensa", "Saquillá" 和 "Zaquila". Mariana Ajtzip Coyote 和他的女儿 Florinda María 和 Isabel Yos Ajtzip 被武装到牙齿的、身份不明的男子拘留,这些人残暴地把他们从家中架走,趁着天黑把他们推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并带到一个不公开的地点。"Enfoprensa" 又说,该村在二月大约有4个人被屠杀。

(aa) 1985年6月21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Patzún. 8名身世不详的人。Chimaltenango, 的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代表 Andrés Coyote 控诉,这些人在一些武装到牙齿的身份不明的男子手上失踪,用没有牌照的车辆把他们带到不公开的地点。

(bb) 1985年7月5日至11日, "Enfoprensa", 总部设在 Quetzaltenango 的危地马拉人权小组委员会表示, "Saquila" 的8名村民被军队成员绑架。7日10发表的名单计有 Juan Pablo Toj, Eustaquio Toj, Santiago Toj, Encarnación Bay, Esteban Pérez, Juan Ajtzip Coyote, Florinda Yos 和 Isabela Yos.

(cc) 1985年6月27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Enfoprensa", "Saquila"/"Xaquila". 6名村民在执行平民巡逻警卫职务时被绑架。

(dd) 1985年7月2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Patzún. 军事委员 Nicalás Ajcalón, 和 Julián Sinoe Ajbal 于6月26日失踪。他们浮着的尸体在教堂背后的水渠中被发现。

(ee) 1985年7月3日,危地马拉报纸报道 Poniente. 证实如上,但是军事委员名 Nicolás Ej Jolón Ansul, 另一男子名叫 Julián Pimey Ajbal, 而且发现第三具尸体,所有3人的喉咙被切断并遭砍头。

(ff) 特别报告员获悉在7月下旬,在接近 Sololá, 省边界的桥上有两个人被袭击;1人被杀,另一人重伤。一名市政府雇员 Mario René Cienfuegos,在 Patzún 的教堂前面也被枪杀,两宗案件的肇事者都没有被查出来。

102. 这一系列的投诉和新的报告指出了一些事件。主要的控诉显然是:

(a) 在1月20日至23日左右, Xeatzán 村两部分发生重大屠杀;

(b) 在12月底或1月底, Xepatán/Popabaj/Chisiquiá, 发生4宗暗杀,包括两名叫 Cocón 的男子其他两名或者甚至4名的男子;

(c) 4月 Chiquel 发生一些失踪事件;

(d) 6月在 Xeatzán Bajo 发生另一踪屠杀;

(e) 实际称为 Saquiya 的村子发生失踪事件,这个村子离 Patzún 镇中心大约2公里。大家不认为“Enfoprensa”暗示 Saquilá 在2月发生一宗屠杀;有关的报告也许是指 Xeatzán. 也许发生其他的重大事件,可是,不是没有指明确切地点就是特别报告员没有充分时间进行调查。然而,他确实在 Patzún 镇、Saquiya, Xepatán、Xeatzán, 一个名叫 Chichoi 的村子和介于 Chimaltenango 和 Sololá. 之间的省边界的一条桥上,花费了一整天时间。这个市区面积有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有一片又高又广的山林延绵到西边。这个市区位于目前的泛美公路以西,可是从首都至国家西部的旧的主要公路穿过该市区,而且提及的多数村子座落于这条公路旁边。

103. 应当澄清有关的情况。大约在三、四年前, Chimaltenango 省的大部

分在游击队控制之下连泛美公路也无人敢通过。这一地区几乎被宣布为“解放区”。在1983年在访问过 San Martín Jilotepeque Choatalún 之后，特别报告员就此作出了一些报告（参看 E/CN. 4/1984/30，第4.8段）。在政府收复对该地的控制触发的战役中，平民当中显然有很多伤亡事故。1985年在 Patzún 的武装集团也许是游击队的主要残余。当地的平民、甚至有关当局不知道或不想说这些人是谁。然而 Gregorio López 在1985年7月12日在“本周”的文章中自称为一名“ORPA领导人”，并且，“评估游击队的实力”。关于6月发生的事件，他表示：“在革命武装阵线游击队的据点——Chimaltenango Patzún 有16人，其中包括10名平民巡逻队员被绑架。有4人在一家修道院被发现，喉咙被切断”。

104. 不管这帮人是谁，他们在该市区至少已经活动了3年。军队一直在搜索他们，但是没有收到成果。这帮人的活动之一是袭击和抢劫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人。上述的桥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点，因为这是当地居民的公共汽车前往 San Lucas Tolimán 大市场必经之路，所以是一个进行埋伏的理想地点。公共汽车乘客受到抢劫，小汽车的乘客也是这样。有一次，整车被这帮人拦途打劫而受惊的人后来向 Godínez. 的军事分遣队投诉。军队在桥上发现这帮人，可是让他们沿着河的下游溜走。1985年7月，该桥成为一名青年男子被杀害和一名女子严重受伤的现场。这帮人用各种颜色的油漆涂上“EGP”，“FAR” PGT” 的标志。

105. 当地的居民也设法捉拿匪帮。大约在3年前，特别报告员获悉该地的男子手持砍刀进入山区搜索他们，可是毫无结果。有关的袭击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事件发生后人人害怕。但待大家镇定下来后，又再度发生。在报告这一部分中，特别报告员完全是引述他第一手获得的资料；然而，由于村民心惊胆跳，他至今尽量设法避免透露资料的确切来源。除了匪帮的活动外，在 Patzún 镇驻有一个军队分遣队。在1985年初，这个分遣队由“Cabrera 上尉”（可能

是一个化名)指挥,后来他调到其他地方。特别报告员与他的继任人进行了交谈。危地马拉以外的评论者认为“**Cabrera** 上尉”是一名严厉的军官。特别报告员向当地居民调查,看看究竟“匪帮”有没有可能是军队的分遣队。从第一手的证明来看,有一名证人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另一个可能是一批在山区非法酿酒的人;直到特别报告员访问之前,两人(一人为妇女被捕)并关在 **Patzún** 的警察局。后来两人被罚款并释放。然而村民投诉这批人企图利用他们的私酒攫取金钱,如果他们认为有任何人检举他们,这可能进行报复。**Patzún** 的平民当局肯定这些人和主要的犯罪匪帮没有联系。然而,这些人助长了一般的_一不安和恐惧。特别报告员获悉,“只要有人检举,证人就无影无踪”。

106. 关于上述的具体检举,特别报告员获悉如下:

(a) **Xepatán** : 1月没有人被杀。最后的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在4年前,当时他们的卫生站被袭击,药品被偷走;

(b) **Xeatzán Bajo** : 1985年5月国际大赦社的一个小组访问了该村。当特别报告员到达时,其他村人推举出来的主要发言人显然害怕。他说他告诉国际大赦社的一切后来也告诉了特别报告员。然而,他后来受到军队的严重处分。他需要很多保证才敢再次谈话,特别报告员采取了措施,保证事件不会重复。他说在1985年1月21日或在任何其他时候该村没有人被杀。然而,在上述日期有8个人晚上失踪,后来从未露面。肇事的男子穿便服,带有各种武器,包括 **Galil** 步枪(军队的武器)。他们进入指定的房屋,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要钱。

107. 一批村民花了一些时间计算究竟村子有多少人失踪。过去3年失踪的人数共有22名男子和3名女子。

108. 村民要求特别报告员请求国家重建委员会提供学校、保健中心和社区中心方面的援助。

S A Q U I Y A

109. 特别报告员设法取得有关在6月传闻有8人失踪的资料。村民证实事实如此，并且有更多失踪的案件。然而，有些失踪的人重新露面，有一个人在田野里找回来。他说他晚上在平民巡逻队值班；军队的人来把他和其他5个人带走，其中的3个人仍然失踪。他觉得他被带到 **Patzún**，然后到了Chimaltenango的军事总部，虽然他的眼被蒙上，双手被绑。他说他与其他人没有接触。他说他得到适当的饮食，记不起曾经受过盘问。18天之后，他被送回 **Patzún**，并根据大赦获得释放。此后他没有任何问题。

110. 特别报告员前往访问 Chimaltenango 的指挥官，他最近才负责这个指挥部。他曾经负责在 **Patzún** 市政府大楼进行的大赦仪式，当时（即1985年7月）一批人获得了他们的大赦文件（关于在 **at San Ildefonso Ixtahuacán** 进行的一项类似仪式，参看 E/CN.4/1985/19 第47至51段）。仪式虽然不是公开，可是家属应邀出席。他让特别报告员观看了仪式的录影带。在 **Saquiya** 和特别报告员交谈的人清楚地出现。指挥官说，在军队分遣队扫荡匪帮的行动中，有关的11个人被抓。他承认特别报告员的检举人在军队确定其身分时被拘留在军事总部，可是没有18天那么久。

111. 已将11人的名单转交给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112. 上述的报道显明，对于提出的控诉不能提供一个单纯的解释。在 **Xeatzán Bajo** 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一项严重的绑架；没有一场屠杀、更没有两场屠杀的证明，也没有任何酷刑的证明。在 **Saquiya** 有人失踪可是对于两宗案件谁是肇事者的问题没有一个容易的答案。

Santiago Atitlan

113. 这个市镇位于Solola的火山湖Atitlan的西南岸。它引起国际注意是因为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发表了两封由一个其修道会在俄克拉何马的美国神父John E. Vesey在1984年11月所写的信。他当时是教区神父，虽然管区主教在1985年8月前已将他调到另一教区，特别报告员不够时间去找他。

114. Vesey神父具体指出的是：

(a) 来自同一修道会的另一个美国神父Stanley Rother，当地人称他为Padre Francisio（显然为一个在当地极受尊敬的人），于1981年被谋杀的事件；

(b) 对他本人的谋杀恐吓，包括有一次其教区住宅被携带武器的民政当局包围；

(c) 军方准备肃清该区的游击队的声明；

(d) 将居民或者部分居民迁到模范村的计划。

115.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刊物在该两封信前面附上前言，详细说明该区从1980到1984年的冲突。他们指出模范村的地点是在附近的Nahualá市内，并着重指出Santiago Atitlan的紧张气氛。

116. 毫无疑问，该市多年来一直发生冲突。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说，因为该市地理上位于三个名为Toliman、Atitlan和San Pedro的火山之间一条山路的一端，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以前已经是来往Altiplano和南部海岸平原之间的路道必经之处。但现在往来交通包括仍然使用这些老路的游击队；人民武装革命组织的游击队据其自己的刊物宣布活跃于该地区。1985年1月Santiago市政府大楼、邮政局和其他大楼被烧毁，看来最可能是游击队所干的。

117. 特别报告员在1985年8月去了该市。他发现，虽然《画报》在四月的一篇文章刊登了军方的公布，说该处已渐趋平静和回复正常，但该村事实上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六月和七月发生失踪和杀人事件；一名死者为药剂师，于19

85年6月26日在其店被谋杀；八月初，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在市中心光天白日下开枪打死一名公共汽车司机，行凶后逃掉。

118. 该市和邻近村落的紧张气氛很明显。教堂的一名修女告诉特别报告员，虽然 Vesey 神父特别感到震惊，因为他初到该地，但这类事情平常得很，而且继续不断发生。驻军和平民之间甚少联系；后者公开在街道上向特别报告员的队伍，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作出指责军队的言论。

119. 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虽然最妥当是随身携带身份证明，而且人们晚上不敢外出。平民巡逻队进行巡逻，但他们连大刀都不愿意带。当局为问话进行逮捕，从证据看来，有的人获释放，有的没有。

120. 还有两点与 Vesey 神父指出的事情有关：(a) 他本人在八月时仍安然无恙；(b) 没有迹象在 Nahuala 建立任何新居民点或模范村；特别报告员去了该市，没有听闻关于该计划的消息。该处离开 Santiago 三个小时，位于湖的对岸。特别报告员认为，那个地方不适合 Santiago 居民，不仅是距离问题，而且 Santiago 的 Tzntunil 人与 Nahuala 的 Cakchiqueles 人的文化背景不同。

121. 特别报告员在 Santiago 外围的 Panabaj 和 Tzanchaj 村调查了若干声称失踪事件。他有五个人的名字；村民证实所有这几个人和另外一些人确是失了踪。特别报告员找了六个失踪者的家人谈话。说服他们谈这些事并不容易。特别报告员需要讲清楚他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并答应不公开他所找过的几家人的名字。（特别报告员将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讨论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这些失踪事件发生于1985年3月和4月；事发过程基本上相同。劫持者在夜里行事，穿着平民服装和（在其中一起案件）运动鞋；使用的武器同军队一样。一批蒙面人有一次配合行动，同时从两个房子掳走几个男人和男孩。这些人在殴打那些男人时也不作声。考虑到村内小房子密布，穿插其间的小径错综复杂，行事的人显然一定清楚知道他们要找哪些人和他们居住的地方，才可以在黑暗中无声

无息地进行搜捕。

122. 有一个案件不同。当事人告诉妻子他要去危地马拉城买布给孩子。后来她再没有见到他，而且连他究竟是否到达公共汽车也问不出来。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那家人家境清贫；该地有直通公共汽车去首都；在 Santiago 和在同一条公共汽车路线上离开 16 公里位于 san Lucas Toliman 的大市场上都有布店。

123. 特别报告员尚未向当地或 Solala 军政当局提出这些案件；事实上他也因其诺言而不能这样做。他罗列了他所能收集到的一切有关资料，但认为尚不足以指出谁应对这些失踪事件负责。

124. Santiago Atitlan 是特别报告员历次去危地马拉调查所遇到的，最紧张和困难的地区。

Finca Santa Anita, Las Canoas, San Martin Jilotepeque,
Chimaltenango

125. 下列为报告发生事件：

(a)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1985 年 4 月。军队开枪处决了约 125 名身份不明的人。

(b) 正义和平委员会，1985 年 4 月 14 日。一批穿着平民服装携带武器的人却持了约 125 人。他们被带到一个偏僻地方，被强迫自掘坟墓，杀死后扔了进去。尸体不是掩埋起来而是用炸药把坟墓炸了来埋掉尸体。（没有说明谁目击这些经过情形。）

126. 这个庄园 (finca) 极为偏僻；因为前述理由，特别报告员没有乘直升机去调查这类侵犯人类事件，所以未能包括到该地一行。他与一个在 1985 年 4 月底曾在该地的人谈过，打听指控是否属实。他将调查的详细性质告诉了该村民。该村民说，1982 年游击队与军队的冲突死了一些人。此后没有人被杀。

但在1985年3月18日晚，约20至25名平民打扮，携带自动武器，来历不明的人闯入庄园，抢了四间房子的人的衣物、粮食和金钱；其中一间房子有一个小店在内。第五座房子因其住户进行反抗而被烧掉。

127. 表面和直接证据均可佐证描述的情节，危地马拉报章在三月底也报道了这件事。

128. 这个地区山势险峻且极为偏僻。很难否定在某处“荒地”不存在一个大石覆盖着，用炸药炸成的集体坟墓。

129. 危地马拉一家报纸在4月20日报导了据称的屠杀事件，但两天后另一家报纸刊登了该省军政长官的声明，否认发生过任何上述事件。

130. 虽然特别报告员没有象亲自去调查那么有把握，但他认为，这场“屠杀”是否确实有很大的疑问。

Paraje Nil, El Asintal, Retalhuleu

131. 据1985年6月10日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报导，Herminio Aguilar Ovalle (68岁)，其女儿 María Carolina (26) 和 Dora Aguilar García (22)；Lorenzo Menchú López (42) 及其儿子 Roselino Menchú Bámaca (12岁) 被谋杀。Menchú 及其儿子正在准备搬一堆“芒果”去 Retalhuleu 市场。他们在路边等郊区公共汽车，但汽车没有到。他们问 Aguilar 家是否可在他们家里借宿一夜，到天亮再起程。据邻居说，夜里听到若干车辆开到的声音，但他们不敢起来。早上他们发现五具喉咙被割 (degollados) 的尸体。正义和平委员会迄今尚未公布1985年6月发生的事件。

132. 据1985年6月7-13日“Enfoprensa”报导，6月12日一批被指出是政府保安人员的武装平民杀死五个人，其中一名未成年。他们还搜查了El Asintal 村几间房子。死者被认出为 Herminio Aguilar Ovalle，其女儿 María Carolina 和 Dora Aguilar García 和 Lorenzo Manchú 及其11岁儿子 Dioselino。

133. 危地马拉报纸在6月12日报导，前一天早上有五个人被人用大刀谋杀。死者为 Herminio Aguilar Valle (55) 及其女儿 María Carolina (20) 和 Dora Noelia Aguilar García (22)、Lorenzo Mencho López (42) 及其女儿 Rosalinda Mencho Bámaca (12)。这些事实与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所报导的完全吻合，除了尸体之间发现一个活着的五岁女孩，可能因其年纪被凶手饶了。

134. 特别报告员在其行程上记下了这一事件，以调查有什么事实可证实 "Enfoprensa" 的指证，认为那些人是“政府保安人员”，可惜该地方离开太远，不够时间去调查。

Utzumazate, Barberena, Santa Rosa

135. 这个案件涉及 Carmeño de la Cruz 一家其中五、六个人。正义和平委员会和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都报导他们被一批荷枪实弹开车到他们家的人袭击。其中两人饶存。其他各人被各种口径的自动步枪和散弹枪射杀。那些人一言不发开车离开。正义和平委员会还说，当治安推事（负责处置尸体和进行初步调查的地方官员）要求其他家人和邻居协助调查时没有人出来。该委员会说，“必须着重指出，在危地马拉，任何在这种情况下出来提供证据的人后来不受谋杀恐吓就是受其他威胁”。

136. 两个组织都没有指称这是保安部队所干的事，但1985年4月26日—5月5日的 "Enfoprensa" 指称此事是保安部队的作为。危地马拉报章报导，治安推事（其名字登了出来）立即赶赴现场并指出邻居认为，谋杀可能是报仇，因为那家人赢了一场田地官司。特别报告员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个案件。

Nica de Malacatán, San Marcos

137. 这个案件涉及 Chávez Cax 一家的四个人，父母和两个分别为四岁及两岁的孩子。正义和平委员会说，2月26日，一批武装的人去到他们家，破门而入，强行抓走了丈夫；其妻子跟着他们出去，恳求他们不要伤害他。四个人全被带到 Finca Marylandia 庄园的 Petacalapa 河，父亲被射杀，其余三人则被扔到河里淹死。

三具尸体隔天在河流下游被发现，父亲的尸体则在庄园发现。提出的指控称，“证据摆出意外的样子，因为所有三个人都被淹死”。

138.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报导极简短，但事实基本一样；特别报告员请他们翻查记录，研究是否有指向保安部队的证据，和确定哪些人传出这件事；可以假定起码一定有两个目击证人，案发现场每处一个人。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通过一系列通报人获得其消息，但可惜只能说其报告来自邻居。无法提出任何可以将政府部队入罪的事实。但“Enfoprensa”（3月1—5日）在一篇报导此事的文章（姓名稍有不同）中说，死者为政府所绑架，数天后尸体在河中出现，身上有拷打痕迹。

139. 假如危地马拉报章报导过本案，那特别报告员和中心都没有注意到。特别报告员不追查本案，因为所有记录在案的事实都没有将政府牵连在内。

140. 正义和平委员会还揭露，二月底另外五人在Malacatán市的三次不同事件中失踪于“持械行事的人”手上。

141. “Enfoprensa”（1985年8月16—22日）报导8月18日同一村落发生另一事件。一批被认出是部队的人持械强行进入一间屋子，杀死Cecilia Calderón Fuentes女士和Pedro Pablo Morales先生，打伤两个小孩和掳走Carlos和Héctor López两兄弟。通讯社没有说明那批人怎样被认出是军队的人。

Mazatenango, Suchitepéquez

142. 一宗涉嫌侵犯人权，两个人被谋杀的案件骇人听闻，特别报告员觉得有必要直接向国家警察查问：情节如属实则必须由专业人员调查。据1985年1月11—17日“Enfoprensa”报导所称，军队逮捕了Sololá和Suchitepéquez省两个咖啡园，其名称分别为Monte de Oro和Monte Quina的两个管理人，Luis Armando Pérez Lima和Neftali Morales de la Cruz。他们被带到一个以

美国人拥有的名为 Moca Grande 的庄园为基地的部队支队，经数小时的酷刑折磨至死。报导称消息来自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

143. 《美洲监察》在 1985 年 9 月一份报告内简短地提及上述声称发生事件。

144.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印发的文件所报导的名字为 Luis Armando Pérez Lima 和 Luis N. Yach；庄园名称如上所述，但据说两个都在 Sololá 省的 Santiago Atitlán。指控是，他们被穿着平民服装，携带大量武器的军人扣留，然后被带到在 Suchitepéquez 一个美国公民所拥有的 Moca 庄园。该处在一月初曾驻有部队支队。他们是严刑拷打致死。在 1985 年 1 月 9 日下午，他们的尸体从一架民用直升机上被扔到 Mazatenango 的足球场。两具尸体都有拷打和枪伤痕迹。Pérez 先生被阉割，Yach 先生则头骨破裂。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在墨西哥城与特别报告员口头讨论本案时指出，两人被谋杀和从直升机上被扔下来的方式使人猜测这最可能是军方所干的事，因为匪徒没有直升机。

145. 国家警察说他们知道该案，但上述消息并不确切。该两人并没有死而只是受伤；他们由直升机送到 Mazatenango 的足球场，用绳索放到地上。那里是唯一可确保送他们去医院的地方。警方将提供其记录，特别报告员将作进一步报告。

七. 失踪

146.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自 1980 年开始其工作以来一直关心在危地马拉境内的失踪事件。工作组主席在 1985 年 8 月 21 日将下列数字通知特别报告员：在 1980 至 1985 年间，工作组转递了 1,709 起案件。这些案件均经工作组审慎查核，以确保案件符合受理准则。政府就其中 27 起给予了答复，这些答复澄清了其中 15 起。另外九起非政府消息来源认为已获得澄清。在其 1985 年 6 月的会议，工作组转递了若干发生于 1983 和 1984 年，最

近获得报告的案件。 1985年7月，七起发生于1985年6月的案件根据紧急行动程序予以转递。

147. 向政府提出失踪的案件并不是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见E/CN.4/1985/NGO/26)。 工作组进行该项工作。 它在研究揭发事件后选出那些符合准则的。 特别报告员不提议另外印发一份名单；这样做将使联合国两个行政单位涉及重复的程序。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一份开列在1985年发生的案件的清单。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告知特别报告员，该委员会已将其准则提高，以保证所有揭发事件的表面证据显示负责任的可能是政府机关。 特别报告员欢迎这项改善。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已将74人的名单送交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148. 危地马拉政府被问及这些失踪事件时还是把事件归因到：

- (a) 作奸犯科的人的作为；
- (b) 游击队组织为解决对他们不再有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 (c) 有些人未通知家人就参加游击队去；
- (d) 有些人失踪逃避法网；
- (e) 有些人没有必要证件就出国找工作；
- (f) 有些人，通常是少年，离家出走。

149. 国家警察交了给特别报告员一份名单，上面37个人在1985年1月至这个问题以前已跟校长讨论过。 显然事件的情节都很一致。 校长曾为其中一些人亲自作出呼吁；如果受害人被释放，他或她一般都离开危地马拉。 他们不愿意讨论事件或指出绑架的人，如果他们能够的话。 发生的事件包括：

(a) Mayra Yaneth Mezy Soberanis, 大学心理学院教授，1985年9月被绑架，1985年1月在危地马拉城发现身亡；

(b) **Falvio José Quezada Zaldaña**, 大学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兼建筑系教师。1985年3月23日在危地马拉城其家门外被射杀。其妻 **Mayra Panencia de Quezada** 及其年幼女儿目击他被刺杀;

(c) **Carlos Enrique Cabrera García**, 土木工程师及大学工程系理事会成员, 同时为该系新系主任候选人。1985年3月27日在离开大学校园几个街口的地方遭射杀;

(d) "Enfoprensa" 报道, 1985年6月4日, 全副武装的人在大学校园内杀死 **Edgar Enrique Leiva Santos**, 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候选人。Leiva Santos 教授为大学理事会成员, 曾代表大学出席1984年为减少国内暴力事件而组成的和平委员会;

(e) "Enfoprensa" 指称, 1985年6月26日, 驾驶三部官方车辆的人在大学校园内杀死员工 **Ambrosio Pérez Guzmán** (32岁)。危地马拉报章报道, **Pérez Guzmán** 先生在与另一名大学员工步行过传播理论学院时被来历不明的人开枪打死(《自由新闻报》, 1985年6月27日);

(f) **Agustín Pos Ibay**, 22岁, 大学医学院学生, 据报于1985年4月29日被绑架;

(g) 据报政府保安部队于1985年6月22日在大学内绑架了学生领袖, 经济学院学生会秘书 **Wladimir Amado Hernández** ("Enfoprensa", 1985年6月21-27日);

6月间经正式宣布失踪, 但其后又再出现。这些人年纪大小不一, 但主要是年青人; 最长失踪时间为28天。这份名单将送交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万一其中一些名字是工作组档案上的人。

150. 事实上, 政府有时冤枉了自己。特别报告员发现, 几个在 **Patzun** 市声称失踪的人其后利用特赦再出现。其中三人在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修订名单

上。当局可从当地获得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显然没有统一收集，也没有用来澄清指控。

151. 《画报》在1985年8月报道了另一宗这样的事件。Martun Guarchaj y Guarchaj 在 Solola 省的 Nahuala 的 Xojola 被吸收加入游击队，化名“Pedro”参加各种活动。他据报失踪。他后来利用特赦重返社区。文章没有说他“失踪”多久。

152. 几起失踪事件都是这样弄清楚。但特别报告员无法亲自调查这类案件，除非案件是较大事件中的部分情节。只有政府才有足够资源这样做。

153. 虽然国家警察公开承认有警察参与绑架行动，但政府仍然坚持保安部队与那些行动绝对无关。互助组和许多其他机构和个人提出的案件都没有官方消息。

154. 除上述较重大的事件外，1985年还有其他事件。下面列举了一些例子，原因并非特别报告员有任何特殊理由可归咎于政府机关，而是因为受害者都是与危地马拉境内多年来遭受袭击的机构有关。列举的事件并不包括全部发生的事件。他希望在再去危地马拉以前会获得一些澄清。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大学

155.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造访这家独立大学的校长。讨论主题是当时的暴力事件。这家大学的传统独立性造成一个问题，即国家警察无权过问校区内的事，但大学本身又没有保安部队。另一个问题是若干名大学教职员在失踪后又被释放。

(h) 据报在群众法律事务处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法律系学生 Ovidio de Jesús Cartagena Cabrera，于1985年6月24日在大学内被人持械绑架。据目击者说，虽然警方人员在现场附近，但那些人“肆无忌惮地以极端粗暴的手段”将 Cartagena 绑架走 (“Enfoprensa”，1985年6月21—27日)；

(i) 危地马拉报章报道(《自由新闻报》，1985年7月27日)，Carlos Fernando Paredas Solórzano (16岁)在前往大学会见其兄弟途中失了踪。

工会

156 1985年8月，特别报告员未能象上次那样有机会与工会运动的会员会面（见E/CN.4/1984/30,第75段和E/CN.4/1985/19,第173-180段）。但是，工会会员显然仍是暴力的受害者。1985年初，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的一批工会会员前往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进行了视察。他们向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提出了报告，其中提及以前个别向劳工组织提出的若干案件。该报告提及1980年至1985年所提出的有关谋杀和失踪的各项指控，以下就是1985年报告内所提及的那些指控（1985年6月所编写的报告显然已将这些指控作出最新的补充）：

(a) 1985年1月13日，“El Salto”制糖厂的工会会员Edgar Morales Arias 和Mario Morales Morataya在Escuintla市被绑架，

(b) 1985年1月17日，Amatitlan市的工会会员Carlos Humberto Carballo 在前往Quetzaltenango途中被绑架。19日他被绑架者丢弃在靠近萨尔瓦多边界的地方，他全身被捆绑起来、口被塞住而且也遭毒打。

(c) 1985年1月23日，Ray-O-Vac工厂“SITRADUX”工会的工会间关系秘书Armando Ramirez Pena 在从工厂前往工会办公室途中被绑架了，他是要去为工会的周年纪念进行筹备工作。第二天他就被释放了，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他曾遭酷刑。

(d) 1985年2月17日，CAVISA的一个工会会员Aurerio Coto Melga 在前往工作途中被绑架了。3月14日有人在危地马拉市12区的42街发现他的躯体。他显然曾严遭酷刑。（“Enfopresa”对此案也有报导）；

(e) 1985年4月12日，“Adamas”工厂工会的荣誉和正义委员会会员Celita Floridalma Lucer Lucero当在离开他在Colonia Santa Marta 19区第五大道和第4街的家时便遭逮捕，迄今其下落不明；

(f) 1985年5月23日, El Quiché 农民组织领袖 Sebastran Quino Guarcas 因遭政府安全部队人员开枪而受重伤。事情是发生在危地马拉城。他被送进医院。

157. 特别报告员指出危地马拉新闻(《画报》, 1985年6月1日)提到 Chichicastenango 省 San Tomas 市农民工会受到的压力, 两名身分不明人物在首都跟踪 Quino 先生, 叫他名字, 然后向他开枪。

158. 同时, CLOSL 也在1985年9月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向劳工组织报告说, 危地马拉统一企业联盟(统一联盟)秘书长 Francisco Alfaro Mijangos, 曾接到威胁他生命的电话。

私人部门

159. 根据政府, 1985年8月12日, 农民总协会主席兼总协会派驻国家经济事务机构代表 Roberto Castañeda Felice 先生在首都他的汽车上被几名身分不明人物用自动武器枪杀。("Enfoprensa", 1985年8月9日至15日)的报导是, 那些人是坐在一部无牌照的车辆, 就象“政府安全部队进行这类行动时所用的那种车辆一样”。该协会已要求进行调查。游击组织危地马拉国家革命统一(国家革命统一)发表了一份谴责政府的声明。参照自由工联的报告, 据说在1985年5月, 政府安全部队绑架了统一联盟秘书长的儿子和工人领袖 Juan Carlos Alfaro Alvarez。该工会在1985年5月9日报告了该绑架事件。统一联盟要求尊重他的生命, 而如果要控告他犯某些罪行就应把他提出来审讯。几天后他便被释放了("Enforensa", 1985年5月10日至16日)。

教堂

160. 1985年9月特别报告员在进行访问时曾与一名主教讲过话。罗马天主教会所关心的最近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慈善教会教士 Felipe Bolán Tomás 在 Chimaltenango 省 San Martin Jilotepeque 市的 Los Escobos 教区举行礼拜式时被

据说是政府安全部队人员绑架。 1985年2月13日危地马拉大主教 Prospero Penados del Barrio 阁下谴责这项行动。 政府方面则声称不知道这个事件 ("Enfoprensa", 1985年2月15日至21日)。

政党

161. 据报导, 涉及各政党的事件如下:

(a) 1985年3月18日, 基督教民主党(民主党)报告说前一天有八名穿制服的武装人员在东北部 Izabal 省 El Estor 市绑架了民主党秘书长 Abraham Cucul。绑架时 Cucul 的亲属和其他证人都在场 ("Enfoprensa", 1985年3月15日至21日);

(b) 民主解放运动党(解放党)报告说, 它们在 Chimaltenango 省 Yepocapa 区 Morlia 市的代表 Edgar René Curumaco Garcia 在 1985年3月初被绑架, 然后遭残酷杀害。他是在 1985年3月10日星期日在家被一群身分不明武装人员绑架的, 他尸体是两天后才在 Escuintla 省被发现的(《自由新闻报》1985年3月13日);

(c) Pedro Us Azañon 在 El Quiché 省 San Pedro Jacopilas 市被七名民间巡逻兵殴打, 巡逻兵以为他死了而把他遗弃在路上, 他后来向警察辨认那些人的身分。他是全国中央工会(中央工会)的积极分子, 当时他正在募集捐款。巡逻兵们将他的手脚都扎起来, 然后把他痛打; 但是他却能幸存(《画报》, 1985年3月18日);

(d) 1985年4月1日, 全国中央工会政务工作员和 El Quiché 省 Chichicastenango 区 San Tomas 的独立农民工会会员 Juan Quino Y Quino 被绑架了。 "Enfoprensa" (1985年4月26日至5月2日) 报告说在 Chichicastenango 有人目击这个事件, 而绑架的人是技术调查部的警察。危地马拉新闻(《画报》, 1985年6月7日)报导说, 他是在第4区危地马拉城车站附近被身分不明武装人员绑走的。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指称这件事情是在1985年4月10日在 Chichicastenango 区发生的，而绑架者就是家属们和各邻居都认识的技术调查部警察人员。

(e) 根据 "Enfoprensa" (1985年4月26日至5月2日) 的报导，1985年4月15日有三名民主党党员在 Huehuetenango 省被绑架。这三人是 Guillermo López Pérez Domingo Cruz Tinon 和 Marcelina Castro López；

(f) 大会的一名中央工会代表 Lic Antonio Arenales Forno 在首都他车上被数名身分不明人物打伤，动机显然是抢劫。他头部被射伤，因伤势严重而被送进医院(《画报》，1985年6月9日)。

162. 其他事件包括下列：

(a) 据称 Sanfa Rosa 省 Taxisco 城一名园主 Oscar Antomo de la Vega Molina 于1985年5月18日在 Santa Rosa 省地 "El Pensamiento" 植物园家里被杀死。据报道，约10名穿军装的人在克服受害者警卫员的轻微抵抗后便闯进他家里，对他近距离开枪。De la Vega 是一名高级军官和另一名据说是极右政治家的兄弟。政治评论员认为访种新的暴力行动可能是政府对私人部门和特别是农业出口部门的经济和财政压力所作出的反应 ("Enfopiensa", 1985年5月17日至23日)。但是，据1985年5月19日《画报》的报导，是可疑的游击队员闯进 "El Pensamiento" 植物园杀死该园主的。根据该报刊，当时四十岁的 Vega Molina 是于眼睛动手术后正在家复元中，而当武装人员闯进屋子里时他正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住在该房子的三个人在看电视时遭受奇袭。他们防御了20分钟，直到他们子弹用尽为止。那些犯罪者便开枪打开门锁，当时 Vega Molina 正在房间里休息。一个人打他的头然后对他开枪：

(b) 邻居指认武装人员是安全部队人员，这些武装人员枪杀了 Jutiapa 省 Buena Vista 村落一个家庭的七个成员，当时他们都在屋子里睡觉。事情发生在1985年6月30日的清晨。受害者为 Antolin Orellana、Lu-

cinda Najere、Jose、Augusto、Edy、Lubia 和 lilda Orellana, 年龄分别为 74、67、23、18、13、18 和 30 岁 (“Enfoprensa”, 1985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但是, 据《自由新闻报》报导, 1985 年 6 月 30 日, 同是这些人是被无名人物杀死的; 安全部队已派出人员调查这项犯罪行为。根据这些报导, Asuncion Mita 的调查法官证实这些罪犯是使用机关枪, 他认为这些武器来自邻国萨尔瓦多 (《自由新闻报》, 1985 年 6 月 30 日);

(c) 1985 年 6 月 15 日, 危地马拉大主教 Prospero penados del Barrio 阁下要求立即将 5 月 30 日被绑架的三名本国社会工作者活着释放出来。大主教说这次绑架使“本国因这许多绑架和失踪事件而遭受的痛苦和动荡不安情况更加严重”。这三名社会工作者是在首都从事 Rafail Landioar 天主教大学的一项文化推广方案, 他们是 Felipe Garcia Colop, Lazaro Antonio Mucia Roquec 和 Carlos Sincal Ajuchar 大主教认为要负责任的人就是那些因想将农民作为容易剥削的对象而反对改善农民生活的人 (“Enfoprersa”, 1985 年 6 月 14 日至 20 日)。1985 年 6 月 20 日《自由新闻报》报导作为这三名亲属向法院援引人身保护令的后续措施, 首都法官想确定这三名是否被关入当地监狱里。根据 1985 年 6 月 19 日《画报》, 大主教说这三名是在 5 月 30 日在离开首都一家银行时被武装人员拦截。拉丁美洲的加拿大教会间人权委员会曾与特别报告员讨论这件事件;

(d) 1985 年 6 月 17 日, 政府安全部队在首都郊区枪杀了 18 岁的 Jorge Zillescas 和一名身分不明的未成年人 (“Enfoprensa”, 1985 年 6 月 14 日至 20 日)。根据 1985 年 6 月 18 日《自由新闻报》, 在首都 El Mixco 区的 Aguacate 村发现两个年轻人的尸体, 一个被指名为 Jorge Alberto Zillescas Lopez

(e) 当特别报告员在危地马拉时，他从邮局收到一份宣誓书，其中谴责 1985 年 4 月 22 日 Rolando Belarmino Guzman Lopez 在 San Marcos 省 El Tumbador 区 Las Delicias 城的失踪事件，失踪者家属显然曾尽力试图寻找他而结果要向特别报告员求助；

八. 秘密监狱和民间巡逻队

163. 有若干指控说有些人已被和正在被关入危地马拉的各个秘密监狱。一份载列可疑地点的名单已送交特别报告员。其中包括首都的若干军事和警察机关、各省的军事总部和两个位于各称已被确认的省的植园。

164. 特别报告员于 1 月中进行访问时曾向国家元首提出这个问题。该元首告诉特别报告员他可以自己视察他所选择的任何这些地方。据上次报导，他在 1 月中到过一警察局和三个军事机关（见 E/CN.4/1985/19，第 72—79 段）。但是，国家元首建议他今后应未经事先提出任何通知而进行这种视察。特别报告员在他 1985 年 8 月的访问中试验了这个建议。他在访问的第一天便未经通报姓名进入离首都约 30 公里的一个大军事训练区，负责官员当然大吃一惊；但是他立即答应带特别报告员去该地区内的任何地方。特别报告员尽量在两个小时内步行和乘坐吉普车视察该地区。负责官员还请他过夜以便等二天继续视察。这次的经验指出，在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将是一样的。所发出的命令显然是，如遇有任何这种要求就应立即受尊重，而所有门户也应开放。该项指控就是这次进行调查的理由；但是指控并未获证实或证明为误；而政府方面也提供一切方便。

165. 秘密监狱的目的就是要加以隐蔽。这些资料是由那些曾失踪而后未被释放的人和那些于 1982—1983 年在特别法庭（1983 年已被取消）的管辖下的罪名被单独禁闭的人提供的，资料指出他们是在首都和其他地方的普通房子里被监禁的。从来没有人能告诉特别报告员地点在那里。此外，有些人会说大家都知道特别报告员人已在危地马拉，而他可能突然出现在军队或安全部队所属的任

何基地：因此要保证使他不管进行多彻底的搜查也不会找到任何秘密拘留犯是极其简单的事。

166. 特别报告员这次没有视察名单上所列任何机关。但是，他却从最高法院院长得知院长本身看过 Granja Penal de Pavon 地下室的房间（见上面第 53 段）。

167. 据称国防部长在首都的官邸 La Casa Crema 地下室有一个秘密监狱。其他地方也有一个总统官邸。在危地马拉国外的人都普遍认为国家元首（兼国防部长）是住在总统官邸。事实并非如此。他在 Rios Montt 政府时就是国防部长，从来都未离开过 La Casa Crema。特别报告员告诉他说据称他住宅的地下室是用来作为秘密监狱的。他说他欢迎特别报告员自己去看，他全家人，包括孙子女都住在该屋子；他不想把拘留犯关进地下室这样来对待他的家人。

168. 除了他能随时立即视察任何地方以外，从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是，从在 Chimaltenango 省军事总部里所说的话中可以提出一个意见（见第 110 段）。司令官说如果有人被军队或民间巡逻队逮捕而想获得所继续提供的大赦，所涉及的问题有两种。第一，有时人家不愿意揭示身分和住处。司令官说他的政策是要把这些人在最短期间内留在总部；而在这些人揭示身分之前很难把他们送回家去。对于那些 Saquiya 人的特别情况，他不同意他们曾被拘留 18 天，但是程序显然是要花费时间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拘留而不通知其家属。第二，那些接受赦免的人通常没有（至少没有立刻）回家恢复正常生活。理由有很多：担心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报复、羞耻、慌乱等等。

169. 从某一些事实得出一般性结论是不对的，但是一份报告如何能如实发表关于一个人被省军部拘留一段期间而不通知家属的事也是不难看出的。问题自然是这一份报告内所载关于拘留情形和拘留期间的理由的资料是否完全真实的。

170. 设立民间巡逻队组织的政策已广受批评。在上一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收集了关于服役条件、值勤时间和巡逻员对这项义务的态度详细资料（见 E/CN. 4/1985/19, 第 123-139 段），这项资料显然误解了要点。例如人权委员会认为

实际规定平民参加的这种服役对人权（特别是结社自由）构成绝对的违反。但是，评论家并不认为根据国家法律军事服役也要受同样的控诉。

171. 因此，特别报告员便不再提议将有关每个村庄民间巡逻职务的事实和意见按目录分类。一般的态度保持不变；如果任务艰巨，人人的工作和自由显然就会遭受破坏，但是由于所带来的安全感通常也被认为是值得的。即使在最近几年没有发生动乱的地方，民间巡逻也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性。

172. 该问题必须在新宪法下获得解决。除其他的民间任务外，这便规定要根据法律（第135(g)条）服兵役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但是，第34条承认结社自由的权利，规定不可要求任何人参加或加入为自卫或类似目的而设的一个团体或协会的成员（不包括专业协会）。因此可以说，如果要继续维持民间巡逻队就需要制定符合这些原则的法律。

九、发展极和模范村镇

A. 导言

173. 现任政府所采取的一项农村发展政策已大受批评。该政策的战略是要在四个地区执行一项复杂的计划，即将从约1979年开始发生的冲突而遭受普遍变动和破坏的地区的人们重新移殖。这四个地区是Ixil Triangle, Playa Grande, Chisec（包括Acamal）和Chacaj。在每个地区内有建造或重新建造个别的村镇，而这些村镇有时则被误认为“发展极”。但是，在这四个地区以外进行的其他个别新的农村项目也是使用同样的办法，例如Alfa Verapat的Yalijux（见E/CN.4/1984/30,第7.36(g)段）。

174. 在这四个发展极区中，Chacaj是西北Huehuetenango省邻接墨西哥边界的一个移殖区，目的是要至少暂时供返回的难民使用（见E/CN.4/1985/19,第213-216段）。Playa Grande的移殖区从北部Quiché Ixcán Playa Grande区的

Chixoy河的主要路桥往南发展。 其他两个移殖区也有大发展，特别报告员建议依次讨论它们。

175. 但是，首先必须确定据称整个制度有违反人权的根据。 这是集中于评论规定平民在某一地方居住或对他们行动和旅行自由和在他们究竟意想要居住的自由有任何限制所涉及的对人权的违反。

176. 1985年2月，Beatriz Marz 博士向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极端的批判性意见，他没有指明所视察的地区：

“郊区基本上是在军队的占领下。 这种占领的另一部分就是各模范地区。 军人计划这些移殖区目的是要有战略性地将农民集中起来，以便密切监视和管制他们的行动。 此外，军队正在试图通过“再教育”的办法来转变这些土著人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开发署）授权编制，而由高地地区援助方案编制的1984年3月的报告有提到上述Chacaj “模范村镇”。 据说有38个家庭（167居民）和许多军人住在该村镇。 这个村镇已成立为一个军事基地而各家庭便被邀请在该区域定居。 ……在该村镇居住的人没有一个原来是居民。

“军队的农村发展计划现已包括70个这种‘模范村镇’超过所估计的100,000印地安人。 迄今所采用的方式通常是类似的。 原来的村镇已被摧毁，居民被杀死、因军队的恐怖统治而分散或由于恐惧而逃避。 在新移殖区开放之前，军队用精锐部队建立一个军事基地：而有需要时则修筑公路。 有时候这些公路是由农民本身通过‘以粮代工方案’建造的。 ‘模范村镇’居民都是原来逃走而现在因患病体衰和极度饥饿而向军队投降的。 其他居民则由军队经常利用民间巡逻队从周围山区扫荡出来。 还有其他的就是从郊区各不同地区带进来。”

177. 其他观察员则不想作出一般性结论，他们认为在不同村镇并没有采用普遍性的方式。对此，特别报告员补充说：(a) 军队对一些村镇居民肯定有限制他们的行动；这些限制则因战术军事考虑而各有不同，和(b) 每个极和村镇的情况以许多方式大力发展，因此对任何村镇或地区作一次的视察是不能作出充分的评价的。

B. Ixil Triangle

178. 1983年，这个地区包括 Nebaj, Chajal 和 San Juan Cotzal 三个城镇，连接这些城镇的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即从 Nebaj 朝东至 Palay，然后分义至 Chajal 和 Cotzal。1983年7月，特别报告员乘吉普车到这些城镇进行视察（见 E/CN.4/1984/30, 第7.3.6 (c) 段）。离开这三个城镇后农村一些道路便十分崎岖，只能步行来往；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农村仍处在冲突的状态。这些地方的居民并不是在墨西哥的难民或他们在本国内大部分是聚集在这三个城镇。

179. 六个月后便在 San Juan Acul 建立第一个新村镇（见 E/CN.4/1984/30, 第7.3.6(f) 段）。当时有一支军队驻在该地方。1985年8月后，这支军队便撤出该地方。

180. 一条连接 Acul 和 Nebaj 的道路已建造起来，在这条路北部的一条连接 Tzabal 村镇和 Jalquil Grande 临时村镇的支路正在建造中，1985年8月，Jalquil Grande 临时村镇仍在进一步发展（见 E/CN.4/1985/19, 第222—228段）。

181. 东部的 Pulay 村镇已重新建立起来（见 E/CN.4/1985/19, 第200—203段）。1985年8月建立的其他新村包括 Rio Azul（在 Nebaj 和 Pulay 中间，1984年8月完成）、Juil（Chajul 北部，1984年8月完成）、Xolcuay（靠近 Pulay，1984年8月完成）和 Ojo de Agua（Cotzal 以南，1984年12月完成）。特别报告员是在公路上和在空中视察这四个村镇，没有与当地居民谈话。

182. 在Cotzal 东部已完成的村镇有 San Felipe Chenlá (1985年6月由国家元首举行仪式) 和Bichivalá(东部更远的地方, 位于一条取代通往San Francisco 植园的小道的改善道路)。

183. 除了一条通往 Salquil Grande 的一段道路正在建造中, 原来的各条道路已大有改善或已重新修筑。

184. 1985年8月特别报告员前往 San Felipe Chenlá 。据人权委员会报导, 该村镇各家庭的人权受到了违反, 他们被集中起来并受到军事的控制。 该村镇没有驻扎军队, 因此特别报告员只能与平民谈话。 说法基本上是与pulay 的一样 (见E/CN. 4/1985/19, 第200—202段)。 村镇居民(至少包括一个在首都避难的家庭) 已返回各自家园重新耕作。 虽然村镇本身还未准备好; 但是已种植了供1985年收成的作物。 作物有蔬菜, 此外, 在离道路上新移殖区约500公尺的原来村镇上也种植了新作物。 农业专家试验过在这种土壤、气候和高度的土地上种植的鳄梨, 他们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村镇居民认为该水果大大地增加了他们所有居民(特别是儿童) 的食物。 他们也养殖了鸡、猪和羊。 下一个新的作物就是小麦。 该地区已有供电、用水、污水处理、医疗站(尚未有人经管)、教堂和小学。 该社区为这一新村而引以自豪, 因为它改善了他们的旧村: 他们已在耕作自己的土地并收获新作物。 最后这将使他们自给自足并解决其他的问题: 需要他们许多人在农业出口植园内当季节性工人。 这种需要便是控制人民的一种形式。 这些村镇象危地马拉许多村镇一样有一个委员会作出各项公共的决定, 并决定谁可以去植园, 谁不可以去植园。 该村镇是不可以无人居住的, 当地的作物也是不可以无人照顾的。

185. 没有军队并不表示该地区就完全不受游击队的攻击。 1985年8月初, 约有100人来到邻近的Xix 村。 由于他们人数超过民间巡罗队, 他们便拿走了村民的食物等东西。 “ Enfoprensa ” (1985年8月9日至15日) 报导这

是穷人游击队所搞的。他们聚集居民召开政治会议。但是，在 San Felipe Chenlá 并未发生这种事件。

186. 因此，情况虽然因时地而有所不同。1984年特别报告员发现Tzalbal采取了最有限制性的办法（见E/CN.4/1985/19,第223和224段），但是，政府对限制人民的绝对自由提供了很好的军事理由。新移殖区和道路都具有军事目的，这是无可争论的。Ixil Triangle的冲突现已大有减少；特别报告员在三年内报导了重新移殖方案的发展情况。该地区北部可能仍驻有军队，居民也仍受限制。但是，在诸如Pulay和San Felipe Chenlá两个村镇，现在的政策似乎完全是在平民方面，即提高Ixil村民在自己传统村镇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基本评论，人民已住在他们真正想往的地方，而且是住在他们一向居住的地方，他们完全有行动自由，也可以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旅行；但对进入植物园所自己施加的限制除外，因为他们如果能在各自村镇赚取足够收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进入这些植园的。

187.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村镇不是“集中营”。

188. 继续提出的其他指控是关于Ixil Triangle仍存在的本国难民问题。
“Enfoprensa”（1985年3月29日至4月11日）载有两个例子：

(a) 军队在El Quiché省逮捕了Cotzol村的村民（111人，包括妇幼）军方指称在该村发现有穷人游击队营。军队没收了42,000磅的玉米。人权委员会报导这事件发生在“Nebaj”。1985年4月4日的《自由报》有加报导：根据军队公共关系单位的报告，El Quiché省第20军区巡逻队在Nebaj以北11公里的Cotzol村发现了14个穷人游击队的哨所和一个营。在采取这项行动时，111名男女老少愿意接受军队的保护，因为他们说，他们正在受反叛者的压迫。

军队没收了42,000磅玉米和一个装满颠覆书籍的背包。

(b) 同时根据“*Enfoprensa*”，农民团结委员会报导，从3月16日至26日，正规军队和特种军队在 *Tzabal* 村破坏了400多公顷的玉米。同时，农民团结委员会也报导，这些军队在 *Bicoxo* 村将数百名农民，大部分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包围起来，他们有遭屠杀的危险。人权委员会也有报导“*Nebaj*”的玉米已被烧毁。

189. 特别报告员很遗憾他在1985年8月无法亲自到 *Cotzol*，*Tzabal* 或 *Bixoco* 这三个区检查这些事件。他对据称在 *Tzabal* 玉米被烧毁的范围感到惊奇。

190. 特别报告员不想提出自己的概念，他想用相似的例子说明他上次报告的关于 *Pulay* 人民和 *Parramos* 一些人的事情：

(a) *Pulay*：1983年7月1日他在 *Nebaj* 会见了40名来自 *Pulay* 村的人，从外表看来该村在约一年前曾被烧毁过。村民都表示想回去；但是象 *Nebahh Chajul* 和 *Cotzol* 的其他人一样，他们认为这既不是可能的，也不是安全的（E/CN.4/1984/30，第7、3、6(c)段），同时，特别报告员也与一些当时也在 *Nebaj* 的 *Ixil* 村的寡妇和她们的子女讨论关于她们的前景问题，并听听她们对将来的忧虑。1984年8月，特别报告员再与她们所有的见面。*Pulay* 已在原地方完全重新建立起来，各个家庭已返回各自的土地，他们也接受了其中的25名寡妇及其子女（原籍非 *Pulay* 的）和两个家庭（来自 *Nebaj*）（E/CN.4/1985/19，第200和201段）；

(b) Parramos and Tuchavuc: 正义和平委员会于1984年8月发表一项声明, 指称军队在该地区两个村庄——Parramos 和 Tuchavuc——杀死了若干人, 并绑架了其他一些人。Parramos 的情况很清楚了, 因为有若干人也是从那里来的。特别报告员曾与一小批前一天到达的人会晤。Parramos 是位于 Quiché-Huehuetenango 边界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 他们说该村庄落在贫民游击队手里。约有300名村民仍留在那里, 如有巡逻部队接近, 他们便全部迁移到山里去。这批人中有一名男子被迫协助游击队员, 他是在两名兄弟因拒绝协助他们而被枪杀后才这样做。他成为一名训练员, 教人识字, 指导如何操纵武器, 并进行一般的宣传, 指出任何人都不得依赖上帝, 富豪将被消灭, 游击队势必打胜仗。Parramos 的人必须照顾游击队员, 为他们生产粮食, 设陷阱诱捕军队。这名男子有一位朋友曾来过 Salquil, 并回去把他的家人接来。他曾解释 Salquil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此这一批人也逃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将获得一些衣服(他们衣衫褴褛)和一个房子(E/CN.4/1985/19, 第228段)。

191. Chisec 发展点由几个欣欣向荣的新村庄组成。在发展的初步阶段, 特别报告员曾于1983年7月前往视察(见E/CN.4/1984/30, 第7.3.6(b)段)。据特别报告员了解, 该发展点自此之后未有被批评, 直到《画报》1985年8月2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止。然而, 该发展点包括位于其南部许多公里外的 Acamal 村(见下面第193—198段)。

192.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是设立发展点的政策和做法的坦率批评者之一。它曾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一份题为“既无安全又无发展: 危地马拉军事化”的报告。该报告于1985年6月由拉丁美洲问题华盛顿办事处发表, 并由两名专业人类学家 Chris Kreuger 和 Kjall Enge 撰写。该报告阐述了设立发展点的官方政策, 并特别提到 Ixil Triangle 的情况; 但是,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除了 Chacaj 的情况以外, 基本政策并无很大的差异。该报告引述这项政策如下, 引文译自一份政府文件:

“当颠覆分子开始实行绑架大批人口的策略, 以便胁迫这些人参加他们的队伍,

住在偏僻地区的人口家园均被摧毁。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导致大批人口迁移到较大的聚居点，特别是 Nebaj 这个主要市镇。其他流离失所的人也比较逐渐地往这个市镇迁移。

“这种情况在现任〔梅希亚·维克托雷斯〕政府开始掌政时就普遍存在，致使政府决定采取行动，由军队协调并在公共部门参与下，按照综合农村发展政策，实行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原居地的措施，以解决流离失所人的问题。”

193. 该报告篇幅很长，但除了别的事项外，它讨论到 Saraxoch 和 Acamal 的情况。两名作者被大概是管制 Saraxoch 进口的民兵巡逻队拒绝进入该村庄，但他们却去了 Acamal。特别报告员对他们描述该村庄所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争议；然而，他们的结论是：

“最后，是 Saraxoch 和 Acamal 的人权受到极严重侵犯的问题。

“曾与我们讨论 Acamal 情况的其他人说，在实行模范乡村方案的较早阶段，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在 Ixil Triangle 内的 Nebaj 镇附近的 Las Violetas。我们没有访问 Las Violetas，所以我们无法核实这一比较。

“我们不知道 Acamal 的情况是独一无二，还是较早时期遗留下来的残余。但是，我们可以说 Acamal 而且可能 Saraxoch 都是居民的公民权利暂时被完全取消的地方。此外，他们比我们曾经访问的其他乡村的居民受到更严厉的劳改和政治再教育，虽然 Ixil Triangle 的群众集会的内容也是一样（高度着重意识形态）。

（注：特别报告员从未听过 Las Violetas 这个地方。）

194. 这是该两名作者看到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处于可以持续监测的优势，现谨在此陈述他先前曾报导过的在1985年所见的事实。

195. 尽管他在1985年8月间没有访问Acamal，但他曾两次访问该地。然而，他第二次访问Saraxoch时，却发觉那里的情况比他在1985年1月所见的好得多（见E/CN.4/1985/19,第211和第212段）。他与该社区的领导人很熟，他是1985年1月首次在Acamal认识他们的（见E/CN.4/1985/19,第206至第210段）。村长曾是一名游击队员，显然有领导才能。村内有几名士兵，其任何既非提供保护也非实行管制，而是协助执行各种项目。村民完全是原来居住在村内但在1980年代初动乱期间离开了村庄的人。他们返回自己家园后一直异常勤奋地工作，重建一个模范的村庄。村民决定通过两个委员会——一个由男子组成，另一个由妇女组成——处理他们的事务。作出决定的是上述两个委员会而不是军人。工作的确非常紧张，而且村民的确每天在傍晚时出席降下国旗的群众集会。他们强调集会落旗是他们自己的主意，紧张的工作并非劳改而是为了完成村庄建设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例如，有些男子正在中央广场上面铺设一段宽阔的台阶。购买水泥的资金完全来自销售妇女从当地mayi仙人掌纤维编织的绳索所得的利润。实验菜地已证明成功，目前正在整理更多的土地防止它们被侵蚀，以准备进行全面的蔬菜生产。一些蔬菜将供本地消费，但任何剩余在Alta Verapaz中部都有现成的市场，该地目前须依靠首都周围地区供应蔬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前往当地的市镇，有许多人都这样做。那里没有通行证制度，公路亦大有改善。该村的重建工程均有详细书面记录，而且有一套照片说明每一阶段的进程，在村会议室内一个大型布告板上展览。村民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对未来满怀希望。下一步的项目是种植咖啡和设立一个小型养鱼场。这两个项目都会带来现金收入，而养殖的鱼则会增加村民饮食的蛋白质，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现在已有一所学校、一个保健中心、一个小型人民公园和电力供应，并即将进行供应用水的调查。村民从无线电广播中获悉特别报告

员抵达危地马拉，并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希望他重临 Saraxol 亲自看看所取得的进展。

196. 特别报告员详细叙述这一村庄的情况，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社区从接待中心的阶段进展至相当于危地马拉农村地区濒于繁荣之境。他试图提供详尽的事实和村民自己的看法，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概念。

197. 特别报告员这次没有前往 Acamal，因为该村庄现已被确认为过渡中心。该村共有 108 人被要求离开并前往各目的地；他们准备前往当地周围大约 10 公里内的市镇、小型定居点和种植园。他们将于 9 月离去，目前正为他们安排一个欢送会。其他人则计划回到他们的原居地，即该村以东大约 60 公里的 Cahabon 地区。另有一些人已经离去，特别报告员在他们原来的村庄 Chituj 内看到他们，这一村庄位于离开 Saraxoch 更远的山区内。该项目与目前在 Saraxoch 即将完成的项目是一样的，但在 1985 年 8 月时仍处于初步阶段。鉴于 1980 年代初的困境，村民人数曾大量减少，但幸存的人现在都回到自己的田地，开始重建村庄。象其他说 Kekchi 语的村庄的居民一样，他们在离开家园之前都把共有的财富埋藏起来。Chituj 刚把两块平面的磨石和村民共有的木制 marimba（一种大木琴）掘出来。人们认为该木琴被埋在地下三年后仍可予修理。Saraxoch 重新找回来的珍贵财产包括榨取甘蔗汁用的铁制基本碾磨机，这台机器现在已重新投产。

198. Coban 的指挥官说，他的抱负是要各人离开 Acamal 并返回自己的村庄、家园或自己选择的其他目的地。

十、关于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其他项目

提高生活水平的项目

199. 不论对发展点有什么说法，危地马拉正在执行其他项目，以便减少贫穷、文盲、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发生率已因近年来的动乱而大大增加。

200. 以前提出的报告已有资料介绍过国家重建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报告员在 1985 年 8 月访问期间，曾对该委员会兴办的另外三个项目进行调查。

在首都周围的定居点

201. 在危地马拉城和其他市区周围都兴起了一系列临时定居点。 在首都内，许多定居点都建在该地区特有的沟壑内；其他定居点则建在比较平整的土地上。有些已存在几十年，另一些则在近期才出现。 许多居民都是因为在农村贫困和失业而来到首都的，有些则为了逃避暴力。 贫穷和营养不良普遍存在。一名在国家重建委员会任职的专长于公共卫生的医生的领导下，现已开始进行一个试点计划。

202. 为了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现在每月一次第 7 区和第 12 区的家庭派发粮食（玉米、奶粉和植物油）。 粮食来自一个国际援助方案，当地若干慈善组织也给予援助。 受助者都是怀孕母亲和哺乳母亲以及子女在 7 岁以下的家庭。 提供粮食的条件是母亲必须参加一个方案，接受如何把粮食综合为平衡饮食的训练，而且必须定期带她的子女去当地的保健中心称体重，量高度并接受体格检查。 该项目由社会工作人员监督，并取得其他当地人协助分粮的工作，从而使他们本身能赚取一份粮食。

203. 从焙干的粘土和沙子制成的一种烹任用火炉可以使木柴的热力发挥最大效用；其中一些火炉是共用的。 如果家庭可以提供一个小围栏，则他们可领取五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从而能够吃鸡旦、出售小鸡和甚至吃鸡肉。 政府拥有的在沟壑

斟坡上的荒地现在被筑成梯田，种上蔬菜和果树。

204. 特别报告员曾随意到上述两区几个房子访问。这几家人都小心照料他们的粮食储备，并认识到所涉的教育义务。在计划开始实行之前，有一家人几乎出售了他们所有的财物以购买粮食；另一家人的一个小男孩则以看守小汽车、清洁挡风玻璃和可能在城市内比较富有的地区行乞的方式，赚取几分钱。由于这个原因，他就无法上学。虽然所有学校的学生人数众多，而且设备缺乏，但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有的。每名学生每年交付 2.50 格查尔（目前合 0.82 美元）便可在学校吃午餐。如家庭连这笔钱都绝对无法交付，则这些费用可予豁免。

San José Poapuñ, Chimaltenango

205. 这个市镇似乎没有因贫穷而豁免每名小孩交付 2.50 格查尔的制度。这个市镇是 1980 年代初期军队和游击队冲突严重的地区的一部分（见第 103 段）。镇内仍有许多寡妇，其中大多数都有众多子女。有一批寡妇现正接受军队支队的民事官员和当地社区的援助，当地社区租借了一些分地给她们。她们组织起来，种植基本粮食和蔬菜。全国重建委员会在另外 68 名寡妇及其子女之间开发了另一个试点项目；看来该市镇共有 124 名寡妇。如上述计划一样，供应的粮食是玉米、奶粉和烹任用油。她们还领取豆类和大米，并学习如何利用这些粮食以取得健康的饮食。她们目前有 100 只小鸡；她们改装了一所建筑物，并向特别报告员展示了她们的小鸡，而且强调一直都没有小鸡伤亡的情况。她们下一步希望得到编织设备、肥料和如何修补自己的房子的指导——修补房子并不是传统上妇女所掌握的技术。

206. 这批寡妇有许多都无法出钱送其子女上学。即使她们现在获得援助，但她们仍然处于赤贫境况。不属于这一批的其他寡妇及其子女的外境势必更加恶劣。

Izabal 北部

207. 特别报告员曾在以前的报告提及这个大型项目。他在1985年8月访问期间，曾亲自前往视察各项精心拟定的计划付诸实行的程度。他发觉这项计划正在目前新建的一条公路一带的村庄内执行。这条公路与在 Modesto Méndez 以西横过 Franja Transversal del Norte 的公路平衡。这个地方有一条良好的桥梁跨过 Rio Dulce，与公路系统和 Izabal 的 Santo Tomás 港联系方便。

208. 这个地区的村庄人口大部分只说 Kekchi 语。他们来自西边较远的 Alta Verapaz，他们在那里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住在新的村庄已有一代或一代以上。除了村庄以外，这个多山的农村地区还有小村和个别房舍。上述项目完全是以现有的定居点为根据。并没有把人口集中在新的村庄内，虽然一些住在较偏僻地区的人口将可以移送到这些小型中心点，以便利用各种设施（但不能分享从新种的经济作物中获取的利润）。迄今为止，耕种仅能维持生存。Chinacadenas 一个买卖木炭的小型企业已经暂停。因为无法取得理想的价格。鉴于村庄内没有任何人拥有货车，企业主自己就是货车司机，从 Izabal 南部开车前来与村民议价。连使这种情况能够出现的公路也是较新的。约在两年前才逐渐向西伸展，通过 Searranx。因此，许多人都作季节性迁徙，到大型的种植园收割出口的农作物。象特别报告员在 El Quiché 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如果他们不必这样做，则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209. 全国重建委员会的项目现在包括延长公路、提供生产新作物的植物并雇用专家向各村庄提供训练。新作物是可可和 achiote（生产一种红色的自然食物颜料的作物），在 Arenales 还有橙。这些作物都在村内的个别地段和公地上种植，而且都有正式的地契。村庄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安排在公地上种植新作物的工作，并在日后按工作量决定每个家庭应有的利润。

210. 目前正在每个村庄兴建一个保健站，这些保健站由美国慈善组织美国援外社出资。如上面所述，村民目前的饮食得到玉米、奶粉和油的补充。此外还有讲授饮食方法、卫生和计划生育（如有要求）的课程。

211. 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保健、教育和供应饮用水等基本设施，并提供经济作物促使各村自给自足。如要销售作物，则需有运输和收购系统。Searranx 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先进的；其他村庄则在发展的初期。但是，特别报告员尤其注意到下列各点：

(a) 全国重建委员会在任何乡村开始执行项目之前，都在当地进行充分详尽的筹备工作和研究；

(b) 村民投入本村项目并参与协商的程度极高；

(c) 本国资源和可得到的国际资源均加以合理运用，以确保取得进展；

(d) 村民对所发生的情况很感兴趣，认识很深，非常积极。

212. 特别报告员认为 Izabal 项目有良好的开端。当局就这个项目进行周详的研究向当地各社区加以适当阐明，而且作了修改，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它切实有效地利用所有可取得的资源，有关人民都确切认识到这个项目是直接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健康和教育水平的。

213. 当地报告员访问 Searranx 时，附近其他社区的成员都在该村内。他们都渴望在自己的村内开始实行类似的项目。

214. 上述只是已经展开的项目的例子。此外还有其他项目，例如向 San Marcos 省的 12,000 名儿童（许多是孤儿）提供援助的计划。这个想法源于管理未成年人的司法部门，该部门正在对儿童进行人口调查。他们的健康、饮食和教育将受到照顾和监测；参与项目的有外国医生和危地马拉人员，一个瑞士慈善组织和一个危地马拉慈善组织则负责协调工作。

215. 新的《宪法》在《过渡和最后条款》第13条(第八款)中规定拨出国家收入总预算的1%，供反文盲运动用，以便在《宪法》下的头三任政政期门消除劳动人民文盲情况。第14条则规定设立一个消除文盲全国委员会负责经管这笔资金，并将于1986年7月以前通过一条法律，以执行这项活动。

216. 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一直是危地马拉的祸患；人权评论者不断指出这些问题，危地马拉人自己也清楚认识到这些问题。特别报告员曾在以前的报告提过旨在对付这些问题的措施。在本报告内，他陈述了更多筹备周详的计划的例子，这些计划都是由多科性专家加以监督，并与训练和指导相结合，它们目前正在社区内最贫困的阶层间进行。人民现正收到通过各项援助方案来自海外的粮食，他们都知道如何利用这些食品使饮食健康。无论谁赢得选举，新的国会必定有具体的任务。

217. 鉴于危地马拉经济多次崩溃和前景暗淡，上述一切活动都有风险，该国的经济局面不在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范围之内，但它对人权的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

十一、选举进程和新宪法

A. 选举进程

218. 国家元首坚持在1985年8月如期进行选举除非有那方面出了事，否则，在提交这个报告时，危地马拉将有一个民选的国会和各个市政府。如果在第一次竞选中，没有明确的获胜者，则于1985年12月8日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219.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举是否自由公平，其答案主要来自观察员的意见。外交部长说所邀请的观察员来自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且包括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观察员如愿意，可获提供生活费和旅费，包括机票在内。预期将有数百名记者和一些非官方身份的观察员在场。所有人一律受到欢迎。鉴于已获保证国际社会将有充分代表，特别报告员谢绝了邀请。

220. 于1984年7月为国民代表大会组织初选的最高选举法庭现仍继续作业，并且一直没有受到什么非议。它继续办理公民登记，以便他们能够投票。这项工作将进行至1985年9月3日，该法庭认为到时将约有3百万公民办了登记。

221. 自由公平选举的保障措施的如下：

(a) 最高选举法庭所拟订的选举法，后呈交国家元首签署为第47-85号法令；

(b) 非常审慎地检查欲在国家或市一级进行竞选的任何政党或委员会的资格；

(c) 每一部会将选出四个监督政务会，成员名单将予公布。在监督政务会控制下，乃有16,500公民成立当地政务会，以监督选举进程，并且与政党的计票员一起认可点票结果；

(d) 最高选举法庭对将担任投票站工作人员的政务会成员进行投票站布置和作业方面的培训；

(e) 选票将如1984年一样用外国制造的水印纸张印刷。在1985年，由于危地马拉缺乏外汇，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国际开发署方案提供纸张。选票印有投票站所在地区进行竞选的每一政党的名字及标记。

(f) 将设约6,000个投票站，以便利已登记者投票。

222. 在1985年7月30日截止时，已顺利地组成和登记的政党有十四个，立场从右派、中间派到温和左派都有。竞选总统者共有八名候选人，其中有些与另一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联合竞选，如政党的情况一样，候选人的政治立场，从右派至温和左派都有。

223. 1985年11月3日举行总统、副总统、国民大会代表以及市议会议员，由于总统须获绝对多数，必要时将于1985年12月8日举行第二回合投票。国民代表一共92人，其中23个在全国名单上，其余在部会一级，这一级的竞选政

党数目或许有所不同。 将采用霍姆特按比例的代表制，以便给予少数民族一些席位。 总统、副总统和国民代表每五年选举一次。 登记公民在 10,000 或以上的城市，当选者任期为五年，否则为二年半。 识字者必须投票，不识字者听任其决定。

224. 最高选择法庭告知特别报告员公民登记十分顺利。一些报章报道在组党的进程中有少数轻微的不当行为，但已由该法庭成功地解决。

225. 选举的目的在于导致 1986 年 1 月 14 日的政权转移。 但整个时间表比原定的日期晚了一个月，然而，特别报告会所得的印象是，根据下列迹象，将遵照新的时间表进行：

(a) 国家元首说他坚持应当这样做。 该法庭成员一致强调完成这一进程的重要性，并相信一切将会安排妥善；

(b) 1985 年 6 月 1 日，该国政府委派平民担任几乎所有过去由军人出掌的主要职务，包括国家警察总干事、移民局和财政部警务人员（关税和货物税）、国家通讯系统等首长。 仍在军队以外任职的军人只有国家元首自己、国家首长办公室发言人和矿业和石油部长（该部长本身资格极佳自能胜任该职）；

(c) 特赦的效期延至 1986 年 1 月 13 日止（第 18-85 号法令）；

(d) 今年将不提升任何高级军官。 国家元首解释说这特别是为了听任新政府作出这种决定，事先不作越庖代俎。

(e) 该国政府说它无法邀请特别报告员于 1 月底再度访问该国：这将是新政府的事务；

(f)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该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为权力移交作准备。 国家元首说军区（大体上相当于各部会）的司令员确实将交出他们作为各部会内政府机构协调者的任务（见 E/CN.4/1985/19, 第 22 段）。 这些是政府等级制度中的主

要职务，军队曾借此获得很大的权力。特别报告员曾同一位司令员讨论不久将出现的移交；毫无疑问的，准备工作在进行中，但该上校解释说他在未知谁是竞选的获胜者以前，不能定出细节，特别是过渡期间的细节，因为各个政党对将来机构协调的型态的政策各有不同。

226. 有一个事件颇有可批评之处。政治进程中的教育不曾是任何彻底运动的主题。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1984年选举中有大量涂污了的或空白的选票，这导致对个中原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揣测，并且是质疑该次选举是否成功的主要理由。

227. 最高选举法庭表示政治教育显然不属于其职责：它也许会被指控有所偏袒。这个任务或许由各政党来承担会做得较充分，尽管它们的财政情况各不相同；就算这样做结果也未必令人满意。历来当地居民在危地马拉政治或选举方面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1984年有不少人投了票，自从那时候以来，办登记的人更多了。各政党显然试图提高政治觉悟，但教导人们如何投票的教育运动则是由一个私人组织进行。

228. 为了行使自决和参加本国政府的人权，人们必须知道怎样去做。除非观察到选民相当了解情况，可用弃权，涂污了的或空白的选票以表达其政治意见，不然的话，倘若弃权、涂污了的或空白的选票又一次被解释为构成抗议票，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229. 这一点必然是使观察员感到兴趣的事项之一。另一个事项无疑是恐惧或暴力的效果在何种程度上破坏了表达真正政治意愿的自由。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对此尤其关切，因这个问题只能就当地情况加以判断，因为暴力并不是匀布全国的。人权委员会在其第1985/36号决议第13段中呼吁所有当事方为选举创造一个免受恫吓和恐怖的气氛。

230. 特别报告员以前强调为了容许危地马拉人充分行使自决权利，在选举方面应让他们自由地作出最大限度的多元选择（见 E/CN. 4/1985/19, 第 256 (a) 段）。特别报告员被提请注意第 9-63 号法令已废止，以及刑法第 396 条仍然存在（见 E/CN. 4/1985/19, 第 183 和 166 段），后者仍未废止，其内容为：

“第 396 条（非法结社）：凡促进组织协同提倡共产主义思想或任何其他独裁制度，或以犯罪为目的的国际实体一致行事或隶属此种团体之下行事的社团，或促进其业务的人，处二年至六年徒刑。”

231. 特别报告员向最高法院院长询及这一条文对因选举而进行自由结社的意义，结果得到详尽的解释。研究一下 1956 年和 1965 年的宪法，可以看出当涉及共产党或极权意识形态时，这项自由是有限制的（1956 年宪法，第五十四条；1965 年宪法第六十四条）。现行刑法根据 1965 年宪法以第 17-73 号法令确立。政府的基本法规（第 24-82 号法令）载有关于“极权”结社的限制（第 23 (b) 条）。

232. 因此就内部来说，可正确地辩称第 396 条符合宪法。然而，新宪法中却无类似的规定。

233. 特别报告员没有证据显示刑事法第 396 条实际上使任何政党不能在 1985 年选举中进行竞选或者该条曾被援引以对付一个极左政党。然而，这一条文的存在使本来相当慎重的选举准备工作蒙上污点。

234. 最高选举法庭一向参加自治选举法庭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理事会的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1985 年 6 月举行，出席的代表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尼加、巴拿马、伯利兹、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以及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法庭将为第二次会议的东道国，订于九月下旬在危地马拉城举行。会议将在美洲间人权研究所主持下举行，其议程将包括就选举组织和进程的资料和经验进行交流和讨论。讨论了危地马拉 1984 年的选举以

及计划于1985年举行的选举，并且就1984年事件进行分析。

B. 新宪法

235. 这一重要法律文件的若干条款在本报告其他章节将有所评论。宪法将于1986年1月14日生效。据公布，某些过渡性规定，包括选举的法律规定，于1985年6月1日生效，尽管特别报告员看出这与政府的基本组织法及其修正案（于1982年3月军事政变，里奥斯·蒙特政府上台后通过的）有抵触：宪法使该组织法于1985年6月1日至1986年1月14日之间有效但组织法并没有授权国民代表大会立法。然而，看来这些细微之处将不会影响新宪法的效力；选举的法律基础已有明确的法令加以保障；因此对其合法性应无从提出质疑。

236. 特别报告员没有打算对新宪法的许多条款作精确的审查。宪法的前二编直接关于个人及人权；头四十六条与《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是相一致的，尽管还有一些其他保证和改进。在提出这些基本概念之后，比较详尽地论及许多更多权利，例如家庭、文化、教育、卫生、就业和经济权利。司法独立在原则上获得确定，但仍有待进一步立法予以巩固。法官将有全权执行人身保护令和基本自由保护令的宪法保障。如第85段所述，将有一个单一和独立的人权委员会和代诉人。

237. 这些条款看来是令人满意的，但其效力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事实来加以证明。然而，令人目前感到兴趣的，是宪法的拟订过程。没有人声称宪法的内容是十全十美的，但它至少是同人口中最有广泛代表性的抽样进行前所未有的协商的结果，报章对其全部经过都一一加以记载。特别报告员可就正确对待玛雅族当地居民文化一事——这是国际人权关心者经常讨论专题之一——提供一个实例。第57至70条的专题是文化与当地社区的保护与发展，其中除其他事项外，确认使用各种当地语文的权利。曾对第143条（其现有案文为“危地马拉的正式语文为西班牙文。各方言则是本国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行了冗长的辩论。有人强烈要求给予某些方言以正式地位。然而，结果发现方言总数不是22种，而

是50种以上，因而决定所产生的问题将是不可克服的。然而，第八编关于过渡性和最后条款的第18条规定在1986年之内以埃尔基切曼卡奇克尔凯奇语文将这个宪法作广泛散播。

238. 大会在完成其任务之后，将于1986年1月14日任命新当选的国会代表，然后自行解散。

十二. 在墨西哥的危地马拉难民

239. 特别报告员于去年请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就其对危地马拉以外的难民的将来任务，给予指示。他指出这种任务完全属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管辖范围，避免不同的联合国机构的职责出现重复将是好事。大会或人权委员会的决议都没有将有关难民的任何任务归入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之内。

240. 如果难民想回到危地马拉，则使特别报告员感到关注。在编制这个临时报告时，特别报告员无法获得最新的资料，只能注意到：

(a) 正式难民和“经济”难民（那些前往墨西哥找工作的人，因此他们不属于难民专员办事处受理者）的回归。内政部长于1985年8月估计这类人数为1,300人

(b) 在查卡·韦韦特南戈的特别“发展中心”目前的作业方式同特别报告员上次在访问后所述者相同（见E/CN.4/1985/19,第219段）；

(c) 危地马拉的报章报导了一些难民从墨西哥回到本国；

(d) 虽然特别报告员询问在伊萨瓦尔北部的村民他们知否有危地马拉人在伯利兹南部寻求避难，他们答复说因边境太远，所以不知道。特别报告员接受这种解释。当地社区是非常地方化的，而其距离确实很远。

十三. 其他事项

241. 这个临时报告于1985年9月写成，将到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才加以讨

论。 因此，特别报告员想指出：

(a) 危地马拉情况复杂，且不断有变更。 这个报告反映截至九月中的事态发展，最新资料则须用口头提出的方式；

(b) 报告中对参加竞选的各政党所提出的纲领不作任何详尽的讨论；而特别报告员在其访问期间也没有走访任何政治领导人（虽然他曾偶然碰上一名）。理由是如果依照时间表进行，到1985年11月3日将选出国会议员和市政府成员。 总统选举也将举行过，但除非其中有一位赢得彻底的胜利（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将于12月8日举行第二回合投票。 因此，在获悉新政府的政治立场时，再以口头提及该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将较为合适。

242. 特别报告员在该国期间，该国首都曾发生过反对公共汽车加价的示威，其后终于取消加价。 危地马拉报章要特别报告员就示威者和警察的行为发表意见。 一些组织，例如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一个称为海外辛迪加团结组织的国家委员会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向人权中心发出用户直通电报敦促特别报告员留在危地马拉并且提出各种抗议和要求。 当时的报章和电视对事件作了全面报道，人们谈到特别报告员的意见，看到了他。 他还就警察所采用的策略以及法庭对待被捕者的方式向当局进行广泛询问；被捕者有许多是未成年者。 他下了结论，并向报社和电视台表示如下意见：这些都是内政问题，不宜作为其调查的对象。

243.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占领了圣卡洛斯大学的校园。 该校校长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自1944年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事。 政府的基本组织法（第24—82号法令）第42条规定该校的自主地位。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是一个内部问题。

十四、结论

244. 特别报告员不想就即将举行的选举、真正向文人政府过渡的展望或者该国政府是否遵守人权原则，加以猜测。随着事态的演进，这些问题在适当时候将会得到解答。进程本身仍然是令人满意的。

245. 关于人权的主要问题获得明确强调。对发展中心和民间巡逻制度显然持有相反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在这个报告和以前的报告，试图根据第一手的经验以及三年来的经验，提供一些事项以便有助于国际社会作出判断。

246. 对暴力和失踪事件看法相当一致，认为这些事件在1985年仍然是严重问题，对此绝对表示惋惜。警察在侦察这种罪行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对许多曾引起国际间强烈谴责的案件却无结果。该国政府对所告发的许多失踪案件的调查结果，迟迟不予公布，使人感到不耐烦和沮丧；如不公布，将无法知道下一步怎样做。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刑法制度不够完善，对许多被控犯了最有争议性的罪行的人都无法进行审判，特别是倘使这些人已准备好要进行剧烈的法律辩护。这绝不是对“无罪假定”提出质疑，而是逐渐形成以下的结果：民众对法律失去信心，刑法的威慑效果被否定。难怪人们可任意地诉诸暴力。

247. 对保安部队涉及暴力事件的指控，没有得到具体有力的答案（针对游击队的军事活动则除外）。该国政府否认了这一点，但特别报告员只得到有限的解释。就算在有了答案的时候，也经常不予提供，这使那些最初提出指控的人也无从得到消息。

248. 一些最严重的关于大屠杀的指控几乎是完全不确实的，而另外一些关于大屠杀的指控，所告发的似与事实不符。然而，本报告在多处阐明，人权的情况，特别是生命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仍然引起严重关切。特别报告员对这种情况使无辜的平民受苦和忧虑感到十分关切。

249. 已采取的关于提高民众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的重要倡议值得加以适当注意和赞扬。

250. 特别报告员在进一步执行任务规定时得到该国政府和每个人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和合作。

十五、建议

251. 提出建议的对象是现有政府或新政府。也许在目前阶段，现政府不愿作出一些可能对新政府造成羁绊的决定。

252. 国际社会应考虑向司法部门和警察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意见，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将那些犯严重罪行者的缉拿归案和进行审判。

253. 应当作出一切努力，包括于必要时作出新尝试以赢取民众的合作，以澄清一些未解决的罪行，例如本报告所指的那些罪行。

254. 应当考虑关心人权问题机构得以安全地在危地马拉境内作业的方法。

255. 应当紧急考虑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危地马拉设立办事处。这项邀请并非倾向于把现有的冲突分类为内战或其他；然而对这种对峙情况无论如何形容，日内瓦公约是适用的（参看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三条）。这项邀请无论是在周邻国家的难民的事项上或根本上也绝不会导致把危地马拉红十字会的作业取而代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各国红十字或红新月协会，就其管辖范围内执行单一和有效的任务进行协商，这类例子不可胜数。

256. 难民办事处应将正式在其管辖之下的在墨西哥、洪都拉斯和伯利兹的难民清单寄给危地马拉政府。这张清单应与三大委员会工作和互助组及其他所提出的指控所产生的政府手中的失踪名单互相核对。

257. 政府应紧急地将三大委员会调查失踪者的结果予以全部公布。

258. 应确认各个从事提高最贫困者的生活、健康、营养和教育水平的项目。

259. 鉴于有人批评民间巡逻的全盘政策加诸民众的义务本身即违反了自由结社权利，新政府应对该政策重新加以考虑。 由于新宪法第34条的规定，无论如何也许需要对这个事项作重新考虑。

附录一

人权委员会 1985/36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各项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原则,

回顾其 1983 年 3 月 8 日第 1983/37 号和 1984 年 3 月 14 日第 1984/53 号决议, 其中委员会表示关切危地马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

又回顾联大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100 号和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120 号决议, 其中, 大会再次表示关切危地马拉仍在严重和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现象,

铭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 1984 年 8 月 29 日的第 1984/23 号决议中特别指出危地马拉境内的武装冲突不带国际性质, 而是源于结构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

欢迎1984 年 7 月举行的制宪议会的选举, 这标志着恢复民主进程的第一步和定于 1986 年 1 月进行的新的立宪政府的建立, 并欢迎危地马拉政府邀请政治流亡者回国和参加选举, 同时保证他们可充分自由地参加,

重申创造条件使选举能在没有恐吓和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重要性,

赞赏危地马拉政府对专题报告员执行其任务给予合作, 并满意地注意到一份特别法庭处理案件的名单已交给了专题报告员,

还赞赏危地马拉政府邀请一些国际人权团体访问危地马拉并评价那里的人权情况,

认真审查了专题报告员的报告及其他可靠资料和报告, 其中揭露在危地马拉继续发生有系统地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 尽管在某些地区已有一些改善,

对继续发生政治性的暴力事件, 特别是杀人绑架事件和仍有许多人失踪, 感到震惊,

1. 注意到专题报告员的最后报告并欢迎其中的建议；
2. 再次表示深切关心危地马拉人权受到有系统的严重侵犯，特别是对非战斗人员施行暴力、失踪和残杀现象、残酷行为和不经司法程序的处决；
3. 进一步表示深深关切限制性措施对于农村和土著居民自由的限制，特别是武装力量组织和控制的将他们迫迁和重新定居在发展中心的行动，以及强迫他们参加平民巡逻；
4. 促请危地马拉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各级当局和机构，包括治安部队，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并敦促其它有关各方也要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5. 重申对危地马拉一切有关方面的呼吁，要求它们确保执行能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标准；
6. 再次促请危地马拉政府创造必要条件，确保司法机构的独立并使司法机构得以维护法治，包括人身保护权在内，迅速而有效地起诉和惩治那些对该国目前发生侵犯人权事件应负责任的人，包括军队和治安部队人员在内；
7. 再次吁请危地马拉政府允许一个独立与公正的机构在该国监视并负责调查据称侵犯人权的事件；
8. 再次呼吁危地马拉政府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协助调查失踪人士的命运，将其下落转告其家属，并探访被拘留者和狱中囚犯，并允许它们对冲突地区的平民提供援助；
9. 欢迎危地马拉政府和失踪人士家属互助小组之间的对话，以及随后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调查和澄清非自愿或被迫失踪而其下落仍不明的人士的命运；
10. 敦促上面第9段所述委员会全力以赴地迅速调查失踪事件，并呼吁所有各方，特别是警方与军方，与委员会充分合作；
11. 请危地马拉政府发表特别法庭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名单，并说明每一案件的处理结果；
12. 请各国切勿干涉危地马拉内部形势，这可能延长或恶化冲突和该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13. 吁请危地马拉政府遵守其恢复民主的新的时间表，并确保能让各方都参加政治进程的条件，还吁请冲突各方创造一种没有威胁和恐怖的气氛；

14. 决定延长专题报告员任期一年，使他能继续对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进行彻底研究，并请他向联大第四十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向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

15. 还请专题报告员在编写其报告时继续考虑各可靠人士提供的资料，特别是评价对有政治动机的谋杀、失踪、酷刑、司法程序以外的处决和秘密监禁等的指控，以便从调查结果中作出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从而有助于危地马拉人权情况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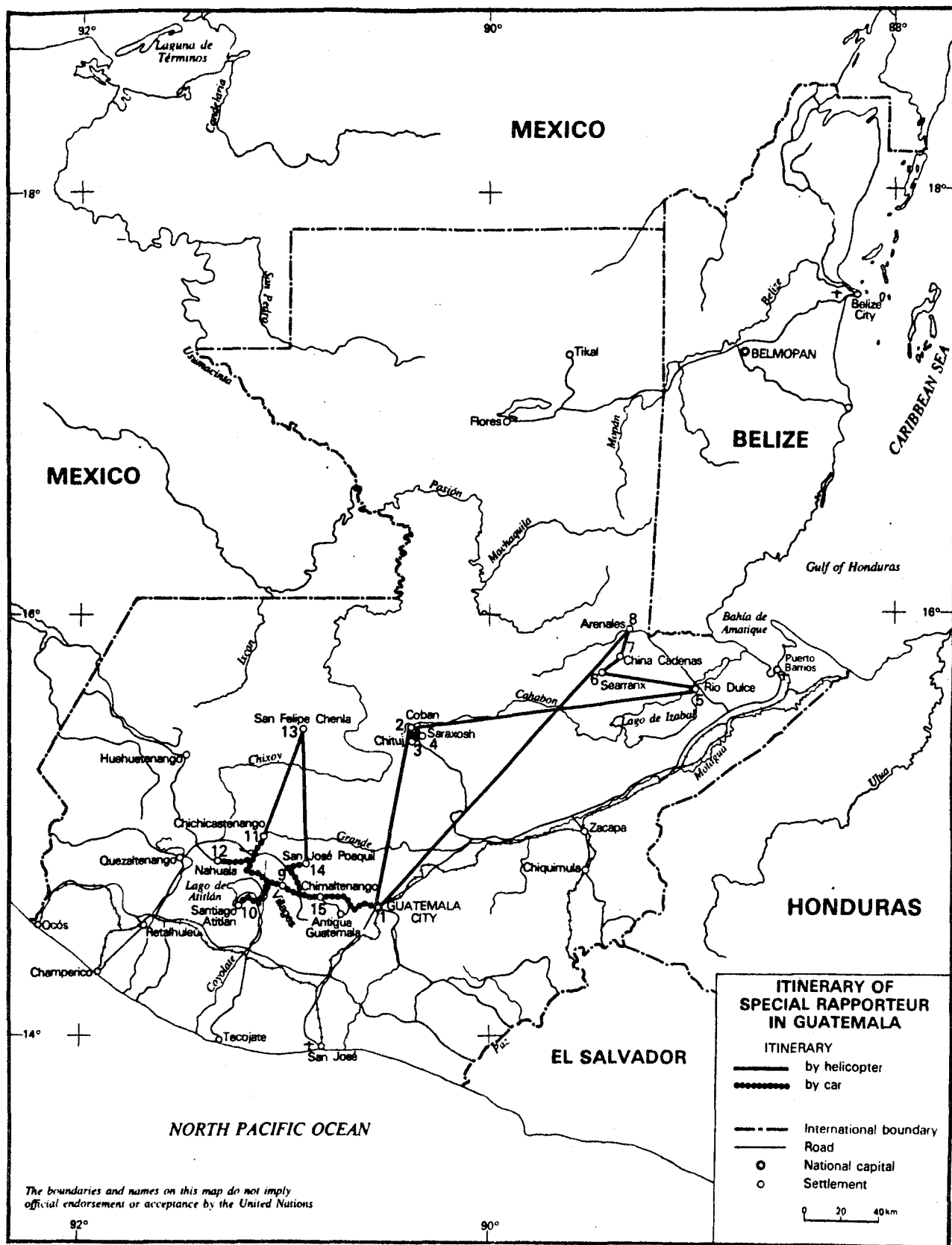
16. 请危地马拉政府和其它有关各方与委员会专题报告员充分合作；

17. 请秘书长给专题报告员提供各种必要的协助；

18. 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危地马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附录二

特别报告员在危地马拉的旅程图



附录三

宪法条文

第五章

人权委员会和律师

第273条 人权委员会和律师 共和国国会应任命一个人权委员会、由在国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各派一名议员组成。委员会应向国会提出律师的候选人三名。候选人应具备最高法院法官的相同资格，并且应享有议员的豁免和特权。另应立法规定委员会及本条款所述律师的职务。

第274条 人权律师 人权律师是共和国国会捍卫宪法所保障的人权。他应有权对政府进行监督；其任期应为五年，并应通过人权委员会向国会全体会议提出年度报告。

第275条 人权律师的职务 人权律师的职权如下：

- (a) 促进政府有关人权的行政程序运作顺利，且具有灵活性；
- (b) 就侵害人的利益的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和提出报告；
- (c) 就任何人提出的违反人权情事的任何申诉进行调查；
- (d) 就受到反对的行政行为私下或公开地向官员提出修正建议；
- (e) 公开地谴责违反宪法所赋人权的法案或行为；
- (f) 就适宜的案子，提起司法或行政程序或申诉；
- (g) 任何通过法律予以委派的其他职务和仲裁。

人权律师应主动或应一个政党之请孜孜不倦地确保在紧急期间，除明文限制的基本人权外，其他人权受到充分保障。他应每星期七天，无论昼夜，都能执行职务。

附录四

尸体剖检报告

危地马拉共和国

司法机关

法医司

“阿图罗·卡里洛医生”

法医报告

尸体剖检

日期：1985年3月31日

姓名：HECTOR ORLANDO GOMEZ CALITO三十二岁，于阿马特兰出生及居住，职业：面包师

法官报告：“上午9时25分于太平洋公路旁26公里处发现目标：鉴定死因为颅底可能破裂。

外部检验：尸身完整。 确立死后僵硬。 面部多处挫伤和撕裂；前臂底段三分之一有淤青数圈。

内部检验：颅底破裂。 大脑和小脑正常。 胸正常。 颈胸器官正常。 心正常。 肺正常。

腹部：腹膜内出血。 胃正常。 肠正常。 肝：右叶破裂。 胆小管正常。 脾正常。 肾正常。 生殖器正常。

死因：肝破裂引起内出血。

阿马特兰

法医

(签名) 奥尔兰多·基罗斯